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7月31日第21期 总第23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1期

目录

【专稿】

- 小 鹰 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
附录一 杨继绳：《天地翻覆》第26章最后一节
附录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及说明）
附录三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摘录及说明）
附录四 BBC 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附录五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摘录）

【评论】

- 余汝信 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
何與懷 无“芯”岂能恋战？
——从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停映下架谈起

【怀人】

- 王晓林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再究一代船王卢作孚之死

【述往】

- 彭先度 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梁沪生 独酌翁自述 情爱篇（一）

【读者来信】

1. 刘国庆：请客座主编是个好办法
2. 崔建功：应该加强工宣队研究
3. 姜学斋：学习女附中，唤起责任感

【本刊声明】

【专稿】

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

小 鹰

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26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为方便读者阅读，我把它放在附录一里。

其中他不惜篇幅全文列出毛远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泽东谈话。凡参加过文革的人，重读起这篇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¹，感觉上很自然地又回到了1976年清明节后的那个文革最黑暗和最压抑的年代。那时国民早已厌倦并甚为反感“文化大革命”，痛恨“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于是借悼念周恩来总理去世之机，爆发了天安门的“四五”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和毛泽东。但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毛派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接下来全国各地没完没了地学习的，就是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指示”。不过，那时人们只有听的份儿，现在我们可以来驳一驳了。

毛泽东这些最后的“重要指示”，充分表达了他发动“文革”的“理由和动机”。文件中毛口口声声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说他要搞的是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成为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要打倒他们。

然而，且不说这样的“乌托邦”是否能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是，任何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具有三个前提，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因为他

¹该文件末尾特别注明“此件不准翻印、传抄，张贴，不广播，不登报。”因此，许多文革时还是中、小学生的人，可能都没有读过这个当时只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毛的那些“最后的思想”到底是些什么货？其中有很多谬论，可以供读者批判。

们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生产关系可能的内在矛盾。（详见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及说明））你问问坚持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些被马、恩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那时的中国存在吗？

完全没有！实际情形是，那时的中国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民生活贫困落后，哪里有什么“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然而，毛泽东在其谈话中却通篇大骂“资产阶级法权”，大骂“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大骂“贪污腐化”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毛泽东和 1848 年被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痛斥过的“德国假社会主义者”一样，也总是“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请注意，马克思这里谈到被“德国的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竞争”和“新闻出版自由”，谈到人民群众要求“法”权和“自由与平等”之权利等运动时，他连用了五个“资产阶级”的定语，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假社会主义者”们“反动”，是因为他们当时反对“资产阶级”在德国的产生和成长！他这样替“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说话，为什么？就是因为马克思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因此，在 19 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 1949 年的中国了。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结论。若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但是，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陈述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达。即如恩格斯所说的：“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详见附录三，恩格斯：《论俄

国的社会问题·跋》(摘录及说明))换句话说：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不可能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水准，无的放矢地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社会”。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及南韩的兴旺富强，也都是些极好的例子。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那里的政府强行要搞“社会主义”而无不遭到惨败。尽管俄国及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主动或被动地搞了些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转弯，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敏感的文艺界更是“先声夺人”，涌现了“人性化”与“自由化”的“解冻文学”，但又统统被毛骂作“修正主义”。

其实，列宁生前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如毛在谈话中所引的，“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的原文是：“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这话讲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告诫封建主的那样，“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但毛泽东和列宁一样，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个事实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事物来加以促进，反而要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打压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结果，毛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定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尽管毛泽东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动了“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来反“走资派”，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哀叹：“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最后一定会失败，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又讽刺那些仍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德国人把“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他们这里所说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不仅是指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还包括

一个由“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也即是马克思告诉人们的，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法国的生活条件”。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和怎么个搞法，那只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参见附录四，BBC 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具备以下三要素在内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个要素便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而那后二者不就是今天许多“改革人士”“梦寐以求”的“宪政”吗？请问：“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的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好呢？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这条路，有什么不对之处吗？落后的中国若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法国的生活条件”先搞起来，让多数人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走资派”又有什么错呢？马克思的那些话显然也是在教训毛泽东，为什么“改革人士”现在还要大骂马克思呢？

而“走资派”刘少奇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主张，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建国纲领，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刘少奇是否比毛泽东要高明些？他是不是读懂了马克思？杨到底为什么要把刘打成“官僚”啊？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讲：“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他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刘修”还是“毛修”？难道“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就是“反官僚”吗？

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思想”中，和他在 1958 年大跃进时一样，还在不停地叨唠，“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

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自那时以来，他一有机会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等一类话，来“证明”他那一套“读书无用”的混话。

无独有偶。于文革发动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也写过一封信给林彪，就是文革初发表的所谓“五·七指示”。信中他要求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构建这种兵营式的“大学校”，和他1958年搞“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毛泽东为我们具体绘制的“军团式共产主义”蓝图，是他恩准百姓今后的集体生活模式。

可是，在马、恩看来，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详见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及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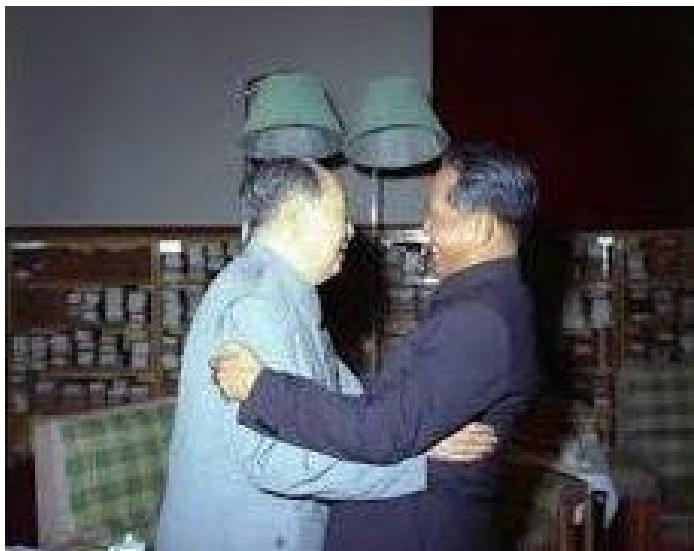
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无论是58年搞的“人民公社”，还是66年推行的“五七干校”，还有后来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及“革命委员会”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在“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时表达的“最后的思想”，是否都是些陈腐的“垃圾”——即马、恩早就痛斥过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显然，顾准是读懂了马克思的这些话，顾写道²：“他（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指出，这些不懂马克思的学生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列宁；它当然更包括毛泽东在内，只是当时不便明说罢了。

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王若水在九十年代中也看明白了

²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p26，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这一点³，我们现在呢？



值得一问的是，从文革勃发伊始时的“五·七指示”，到文革败亡告终前的“最后的思想”，这位类似《1984》书中的“老大哥”一直都在推销他的“乌托邦”计划。如果再把以上他实际做过的那些事情联系起来大尺度地看，建国后的毛泽东定意要走什么道路？他要把中国带向何

（1975年6月毛泽东热情拥抱波尔布特）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拼死一搏，要搞这“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目的又何在？难道现在还看不清楚吗！

如果有人真的不明白毛泽东说的那个“理想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那就请看七十年代中的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首都金边，波尔布特立即宣布全国废除货币、商品，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随后他把金边等城镇200万居民，即毛所谓的“城市老爷”，统统强制驱赶到边远农村，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波尔布特做的不正是毛泽东想做却还没有做到的事吗？！难怪他的做法得到了毛的赞扬，被称为是毛的好学生。（参见附录五，王友琴：《张春桥幽灵》摘录）

纵观中外历史，政治家发动任何“荒谬绝伦”的邪恶运动时，都有一套堂皇美丽的“说辞”让民众去相信他们的“好意”。但我们说过⁴，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³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⁴小鹰，《“文革”问答三》，《记忆》213期，2018年2月15日；亦见：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可是杨继绳却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由此，杨便推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杨继绳等人这样鼓吹“文革反官僚”论，把党内外所有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打成“官僚”，他们是要以这种所谓的“善”来美化毛泽东，从而掩盖毛“文革”的反动本质吗？

现在有人甚至把毛泽东誉为欧洲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的角色¹，说他搞文革如同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初冲击反抗黑暗专制的教皇体制一样。他们把文革吹嘘成是“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解决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的一种“范式”，或体谅它作为一种“历史的试错”，结果毛文革竟然在“事实上促动了中国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临近”！做学问可以如此先入为主、穿凿附会，固然荒唐可笑，但也暴露了“文革反官僚”论者“挖空心思”地要对毛文革以及对自己“有所肯定”的急切意图和浮躁心态。

对于这些文革“专家”的“高见”，我已经质疑过了许多次，都被他们“装聋作哑”，“硬着头皮顶住了”。现在再问一遍：从毛文革的纲领性历史文件来看，包括社教 23 条，516 通知，文革 16 条，“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由毛亲自改定发表在“两报一刊”上无数的“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文革中它们“脍炙人口”，老幼皆知。那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他们现在为什么非要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难道是语文程度不够，看不懂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吗？或者，是出於傲慢与偏见，对事实“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干脆拒

¹唐少杰，《真话有力量，忏悔为希望》，为孙怒涛主编的《真话与忏悔》文集作的序，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年 4 月第一版。亦见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记忆》105 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

听拒看吗？又或者，是要肯定当初“奉旨造反”，而故意偷换概念，不惜给毛泽东戴上“反官僚体制”的桂冠，以便自己也就跟着“不胜光荣”之至？

最近总算看到了一个为“文革反官僚”论辩解的说法¹，就是“当年人们起来反对当权者，虽然喊的口号是‘反对走资派’，其实，内心里真正反对的是当权那些人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以及对老百姓的压制。现在，他们在文章中将‘走资派’改换成‘官僚集团’，多数人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也不是为自己的非正义找借口，而是回复到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但这个事后的说法，如果说这是“反思”的话，却不知如何予以“证明”？此外，我们谈的是五十多年前真实发生的毛“文革”，不是现在他们心里臆想的那个什么“文革”。即使一些人当年真是那么想来着，或者，是现在想要拔高自己，你可以这么宣称，没有人会与你计较，但请不要改写“文革史”，硬把毛泽东拉来替你站台。也就是说，不要用所谓自己“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来篡改历史、美化毛泽东和自己！而事实上，当年紧随毛“鞍前马后”的“铁杆造反派”里，无论是宣称要“彻底砸烂”文革前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团派”，还是强调“不容否定”17年毛泽东“红线主导”的“414派”，又有哪一个真的是在“反官僚”？

不错，毛在其“最后的思想”中也谈过“反官僚”，而且，看来最“打动”杨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些骂“官僚”的话了。可是，奇怪的很，毛指责的“大官们”有“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毛泽东向毛远新说那些“豪言壮语”时，恐怕就是坐在他自己那带有私人室内游泳池的“好房子”里，毛也忘了他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的豪华“行宫”，他自己就拥有最多的“服务员”。此外，为了避免“穷究事情的本质”²，毛更忘了提自己还有用特权霸占的“许多民女”和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获得的“巨额存款”，刘少奇没有。……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把水搅浑好忽悠人？

¹陆小宝：《辨识文革时最常见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见孙怒涛主编，《真话与忏悔》，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²出自杨书的导论，“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优势群体”¹或“泛红二代”中少数仍留恋以往“恩惠雨露”的人，现在说起话来还是毛腔毛调，“鹦鹉学舌”地写文章。不过他们只学了前半句，为我所用，就大骂刘派是“官僚集团”，而对毛后半句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反动”，却不置一词，对“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事，也不作评议究竟谁是谁非，这就完全掩盖了“文革”的本质，明显地站到了毛派一边去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了。

其实，“资产阶级”与“官僚”并无必然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有“官僚”，但比起“封建专制”的社会来说，要少得多。为什么？这里的原因正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的那三要素在起作用，而“封建专制”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则完全没有这些制衡“官僚”滋生的因素，或者，可以套用一句俗语，称它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所以，既然没有官员申报财产的法制，又不准舆论自由与公众监督²，后者历代便只能靠什么“纪检委”来以官制官，或由“自身硬”的皇帝没完没了地搞“运动”来“打虎拍蝇”，才能与“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的贪官污吏们勉强地维持一个“动态平衡”，而且“心安理得”地称之为“新常态”。

但杨继绳却读不懂“资本主义”，也读不懂毛的本意，到现在还把“资产阶级”与“官僚”混为一谈。他甚至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他文中又写道：毛“不甘心失败，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

是的，杨在其“文革史”中鼓吹要把这些“乌托邦”式的“垃圾”语录作为“政治武器”传给后人，他正是在努力帮助毛去了却那“文革”未了的心愿！

杨文对毛的谬论不加批判，却一字不漏地把毛的那些“昏话”列在书中，甚至连毛远新关于“白猫”、“黄猫”的考证细节也“津津有味”地写出来，要人信以为真，并非其

¹按照杨书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²参见小鹰，《美国议员是如何申报私人财产的？》，http://www.azcolabs.com/xy_open_assets.html

“假传圣旨”。真是欣赏有余，割舍不下啊！

固然，杨继绳最后也提到一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讲“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有什么不对呢？

杨现在也认识到，“他（毛）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符合“价值规律”的措施，以及试搞现代工业“托拉斯”，有什么错呢？

此外，西方现代的资本主义不就是杨在“导论”中说要建立的“一种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吗？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等“走资派”，正确理解了马克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主张国家朝这个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新民主主义”方向走，又有什么不好呢？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还提到，“亿万政治愚民”的存在“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如此，那作为当年“政治愚民”之一的我们，盲目地跟着毛的“文化大革命”去反“走资派”，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回来，现在是否有勇气承认：我们多数人那时都错了！现在是否能想明白些：我们自己那时究竟都“错”在了哪里？以及为什么会“愚”到这个地步？

再回到本文题目：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

1967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那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让我们定下心来想一想，究竟毛泽东自己懂不懂马克思？我们多年来又是如何上了这假“马克思”和真“秦始皇”的老当？

这才是些要好好反思的“文革”问题，因为“文革”是专制与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产物，而“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最后，要澄清一个问题：文革之后的中国，是否已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讲，它貌似有“资本主义”的躯壳，却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三要素。更不用说，连美、日和西欧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已不再承认中国是个起码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因此，对于中国的现状，不要去责怪“资本主义”和“走资派”，更不要大骂马克思。这里用得着耶稣的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

写于2018年3月，2018年7月补充修订

附录一

《天地翻覆》第26章最后一节

杨继绳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不管国家领导人有多高的权威，不管国家领导人控制了多少资源，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他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全面变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人们是很难认识、很难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一人之力操纵这个大系统。何况他的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一个乌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题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

批准。)》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

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杨书误为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

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两个多月来零零星星地对毛远新讲的。其中有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内部传达过或公开发表过。当时毛泽东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多年以后毛远新说：四号文件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他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企图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乌托邦思想，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

附录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小鹰摘录及说明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约 50 年了，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惊呼“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便照搬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加挞伐”。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他们：

“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进而马、恩又讽刺道：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话真是讲得“一针见血”！我们今日也可以这样说：既然在中国还不具备“法国的生活条件”时，就以毛式“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政府对付中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中国小市民的利益。

在评价那些想要“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献”时，马、恩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撰写《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时，批判了种种流行的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马、恩说，这些假“社会主义”“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我们现在读起《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的内容来，不免会惊奇，这简直就是为批判100年后的毛泽东们“量身定制”的！■

（引文摘自《共产党宣言》，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1848）

附录三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小鹰摘录及说明

十九世纪中叶，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流行。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她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到十九世纪末，大俄罗斯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而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有整整 5000 万人，再加上野蛮的“沙皇专制独裁统治”，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

那时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却把这种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看为“得天独厚”的优点，以为“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赫尔岑写道：“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到 1875 年还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

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写道：“……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

的人民风尚……”

这些就是恩格斯 1894 年写作这篇文章要针对的思想背景，即，如王若水先生在文革后概括的¹：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该文中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曾质疑过：“这位学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而恩格斯则首先指出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依据的“俄国的土地公有制”的来源和基础，即“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恩格斯继续批评道：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¹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他又写道：“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总之，如果问道：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下经济十分落后的俄国，难道现有的“公社所有制”就“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恩格斯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恩格斯最后强调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王若水上世纪九十年代注意到了马恩的这一论点，他批判毛式“社会主义”时，“画龙点睛”地写道：“联系到一九五八年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事实上，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警告过党内要大搞合作化的主张，他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但刘少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和反击，从此，我国农村走上了“公社化”道路。毛的主张与马、恩的学说“背道而驰”，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切合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

附录四

^[1]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上做的批示，1951年7月3日。

BBC 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共

一些长期研究中国共产运动的英国学者，即使是左翼学者都长期批评说，其实中国共产党革命从开始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这些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原则就是革命需要等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工业化和布尔乔亚资本主义需要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要有相当觉悟的城市化工人阶级领导。

英国学者指出，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和柬埔寨等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尽管都曾经尝试推动拔苗助长式的激进工业化进程，但最终都因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沦为极端主义的“痞子革命”，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明发展都造成巨大创伤。

关注中国发展的英国保守派学者也指出，即使以马克思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即人类社会要从“低级”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最终发展到“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中国也最多只是在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专制阶段，初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距离社会主义文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当权者继续坚持实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马克思。

更多西方学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原则是具有高觉悟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推翻阶级社会，创造无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世界，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今所造成的现实却是极少数统治阶级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继续以封建威权压制和剥削劳动者，因此也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唱反调。

当然，中国政府麾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不同意英国和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和批评，这恐怕是政治学者们可以研争的一个大型命题。■ （责编：李莉 2014年9月15日）

附录五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小鹰摘录

一、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年，柬埔寨制作的电影《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示了柬埔寨人民怎样从城市的家中被驱逐，怎样到集体农场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怎样挨饿，怎样被惩罚，怎样死亡。红色高棉造成的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这部电影相当独特，人物是用黏土塑成的，电影插进了红色高棉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穿插其中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于说明电影故事的由来和成因。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权力带给人外貌的改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迎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与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及张春

桥 1976 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既不了解柬埔寨正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是那时候的“常态”。根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 1976 年 2 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这本 900 页厚的书作者。）

关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么？笔者翻译的《“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的“概论”写道：“在 1975 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 200 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 3 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

纯分子’。在随后的3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3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红色高棉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尽管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上千年了。当食品缺乏时，在公共大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红色高棉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红色高棉统治没有完整的正规学校，孩子们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老师往往是只有很低的读写能力的贫农。到了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乐趣。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的腐败阶级成员。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杀戮的目标，有数千名学校教师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柬埔寨的华侨，虽然没有作为“中国人”被单挑出来进行群体杀害，但是不少中国人因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红色高棉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被指控背叛革命。这个监狱由一所寄宿中学改建而成，1万4千人死于这座监狱。这些杀戮和迫害是在红色高棉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发生的。对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杀害，使得社会改造和转型能够得以进行，直到越南军队侵入，红色高棉退回丛林。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

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3年8个月20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现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有一些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3年8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表面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的武器、食品及各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用以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1分钟长度。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是外国人，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没有漏掉张春桥。这1分钟张春桥的镜头，点睛出了柬埔寨惨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写作者，在我看来，纪录片中张春桥的1分钟内容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显示红色高棉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张春桥对红色高棉的热情指导，也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进行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事情那时候中国还“做不到”。■

写于2016年8月—12月

【评论】

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

余汝信

感谢唐平铸的后人，使这一批珍贵史料能在事发半世纪后公开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作者题记

一、唐平铸的工作记录本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前夕由毛泽东亲自引爆的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处理罗瑞卿问题，



中共中央召集过两次重要会议：一为1965年12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二为1966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锦江饭店会议留下的文字材料，

(1966年9月15日毛接见，[右起]谢镗忠、穆欣、胡痴、唐平铸)惟有叶群在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其余近乎空白。会议的结论，连官方党史界亦只能间接引用会议参加者之一王任重私人日记中简短的两段话：“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¹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京西宾馆会议留下的东西多一些。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68号文



件批转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后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和杨成武等人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4月24日向毛、中央的报告。惟除此之外，缺乏更高层次的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其他副主席的表态。

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得助于当年参加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人员之一、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唐平铸后人的无私奉献。近日，唐平铸后人将其父亲在京西宾馆（1966年9月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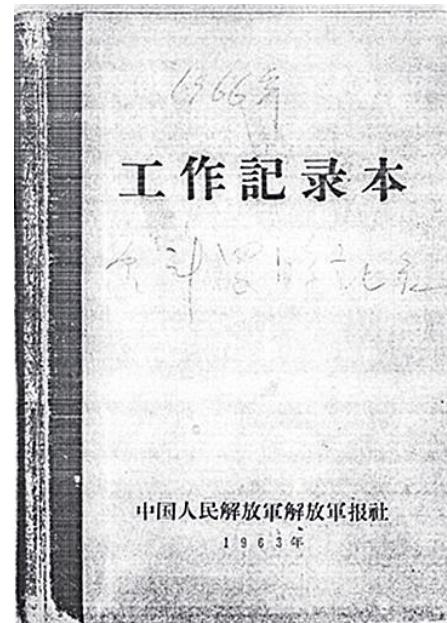
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与唐平铸）会议期间的工作记录复印件，交予笔者整理，以图将当年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决策、方针和措施，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对罗瑞卿问题的态度，较为完整地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

唐平铸所记录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秘书长萧华、杨成武等有关罗瑞卿问题的讲话。上述讲话，记录在一本唐平铸1966年9月14日领取使用的解放军报社印制的11×16厘米大小的工作记录本中。

在披露这些讲话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讲话的记录人唐平铸。

唐平铸（1913—1985），湖北武汉人。1935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1936年在日本留学

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7年回国后参加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共。曾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长，二野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调解放军总政治部，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1954年参与筹办全军性报纸——《解放军报》。翌年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并被授予大校军衔。自1959年新军委成立，受军委主要领导所器重，参加过军内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主持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影响很大的文稿。1961年2月起，任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名义上为报社第二把手，实际上多时为第一负责人。1966年3月，参加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6月，任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三个月后，人民日报社改编委员会为党委制，任临时党委第一书记，再后任临时工委负责人。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员。1968年9月17日，以莫须有罪名被北京卫戍区关押，1975年5月解除关押。1980年2月，经军委批准，总政为其彻底平反，（唐平铸的工作记录本）恢复名誉，认定其遭受诬陷，撤销原中央专案组结论，“属于冤案，应予推倒”。1985年7月20日在京逝世，终年72岁。遗言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病理研究。



二、对有关讲话的若干辨析

(一) 本文附录部分所披露的唐平铸记录的中央、军委领导人讲话，具体的讲话日期并无明确标示。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我们大体上可以判定这部分讲话的时间跨度为1966年2月至4月间。此一时期，有关罗瑞卿问题，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1. 1966年2月1日至4日，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席的军委常委有：

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萧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林彪1965年12月22日、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出席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¹

2. 1966年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杨成武报告了广州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²

3.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根据毛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议。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另成立由叶剑英领头的七人工作小组，由叶主持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42人。3月18日，罗跳楼自杀（受伤）。3月22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转为背靠背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共95人。会议最终形成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送会议领导小组审修、再报中央常委审批。³

唐平铸记录中，标注有两个用汉字书写的日期：“一月四日”和“三月一日”，另有一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2.8”，后者是否表示日期？含义未清。用汉字书写的日期，笔者认为，并不能与讲话日期挂钩。如“一月四日”之下的邓小平讲话，从内容判断，应是邓1966年3月4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始时对会议开法和指导思想的相关指示，时间上绝不可能是在两个月前的1月4日。

综合已知的各种因素考虑，笔者只可认定邓小平的另一个讲话，是1966年4月8日在

¹ 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版，页143。

² 《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版，页429。

³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结束的指示。其他各人的讲话，则难以认定一个准确的时间。笔者只能推测：杨成武传达的毛讲话，可能是在1966年2月22日对叶剑英、杨成武说的；各位老帅批罗发言，可能是在1966年2月初广州军委常委会议期间说的（惟刘伯承似未参加此次会议）；记录中最后的彭真、周恩来讲话，应该是在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刚刚结束时说的。彭真讲话的时间，则绝不会迟于4月16日——彭到杭州接受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他本人的批判之日。

（二）虽然上述有关讲话未有标明准确日期实为一大遗憾，惟其真确性却无可置疑。

举例说，如杨成武传达的毛对罗的批评：“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¹。”“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毛这一批评，杨成武1967年3月19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再次作过传达：“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来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²

将杨成武两次传达相比照，不仅主旨相同，语句也基本相同（仅先后顺序排列有所不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以证实其真实性。

¹ 八司马，前指唐顺宗即位时起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改革，失败后参予其事者八人被贬至边远地区分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指1950年代中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期间八名年轻科级干部因向室领导提意见挨整受批，毛曾称之为新的“八司马事件”。

² 杨的讲话军委当年发过正式文件。本文文本据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编印：《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9月，页62。

再如邓小平在3月4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始时称：“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五点与王任重私人日记中所记载的五点内容完全一致。

(三)上述有关讲话还证实，到了1966年2月至4月期间尤其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后期，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对罗瑞卿问题基本上已形成党内、军内最高层一致的批判性共识。

对罗的批判，军队最高层尤为激越。如林彪称，揭露罗的问题，是“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林的说法比上海会议的结论“与彭黄有别”更进了一步。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贺龙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聂荣臻称，“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

自然，形成共识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根据现有材料分析，身为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邓小平，此期间对罗问题的态度就前后有别。

邓在会议开始时对罗有一定程度上的袒护，这恐怕不是邓一个人的意见。邓称，“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

罗瑞卿自杀未遂，使最高层对其问题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在会议结束时称，“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底。”“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故而，对于邓小平的态度，应该有一全面的观察，断不能如官方史书般片面称其对罗“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准许革命的方针”。¹无可否认，邓的确有过类似言论，但那是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时而非4月该会议结束之日说的，从开始到结束相距一个月时间，邓对罗的态度已判若两人。

三、有关讲话是对官方《罗瑞卿传》的有力批驳

官方有关罗瑞卿生平的代表作，首推以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名义撰写、作者署名黄瑶、张明哲的《罗瑞卿传》。据官方称，该书由总参谋部批准撰写，在总参政治部具体指导下，历时八载，采访一百多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而成。书稿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1996年4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该书体现了文革结束后官方为罗瑞卿辩护、正名的立场和观点。强烈的倾向性使该书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严重扭曲了史实。而唐平铸工作笔记所披露的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使被颠倒的历史得以再颠倒过来，使原来的历史图像得以真实再现，是对《罗瑞卿传》的有力批驳。

（一）《罗瑞卿传》掩盖了毛泽东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论及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批评时称，“（1965年）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但是，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后来，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页1898。

¹《罗瑞卿传》又称，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以后向罗传达过毛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²

首先，《罗瑞卿传》故意没有引全毛对罗的批评。据唐平铸工作笔记，毛的批评全文是：“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毛又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其次，《罗瑞卿传》完全无视毛在上海会议以后对罗的多次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包括但不限于：（1）196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³（2）1966年1月5日，毛在南昌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问题时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⁴（3）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及彭、罗、陆、杨问题时称，“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

¹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页540。

²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49。

³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页456。

⁴ 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400。

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¹

（二）《罗瑞卿传》掩盖了刘少奇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引述了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后称，“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²

《罗瑞卿传》的作者既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档案，理应十分清楚唐平铸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刘少奇对罗问题的真实态度——“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理应十分清楚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及罗瑞卿问题时的明确态度：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同志。但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林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逼林彪同志让位，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

他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他是折中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在军队中企图实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的，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¹ 《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1981年5月。

²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43。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几十个人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他就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¹

（三）《罗瑞卿传》掩盖了邓小平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引述了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后又称，“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²

所谓“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其实是毛泽东向罗搞突然袭击。邓岂能“表示不满意”？！如前文所述，并不排除邓小平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议时期甚至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开始时对罗有一定程度的袒护，甚至不排除邓曾经说过“死无对证”一类的话。但在罗瑞卿自杀未遂后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后期，邓的态度如很多人一样发生了突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邓4月8日北京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之中。邓称，“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邓又称，“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

¹ 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广东韶关专区文化局大无畏战斗队、武汉话剧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上海，页102。

²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43。

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邓称林彪首先察觉罗的问题，“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又批评罗“同林总唱对台戏”，“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这些话，除了表现了邓对林的颂扬和肯定，丝毫找不到其对林“不满意”的情绪。

（四）《罗瑞卿传》掩盖了彭真对罗的严厉批评

彭真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罗瑞卿传》提及，“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发言时要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他说：‘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现在慷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彭真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¹

唐平铸工作笔记记录了彭真的两次讲话，均无以上尤其是所谓“后悔”的内容。虽然彭真在1966年4月下旬被叶剑英等指为在批判罗会议过程中表现“恶劣”，但实际上彭真在当时也不得不紧跟毛的步伐，只不过是说过“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一类稍稳重一点的话而已。唐平铸记录的彭真讲话称，“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

¹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66。

的，甩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五）《罗瑞卿传》掩盖了贺龙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与老帅的关系大都不怎么好，独与贺龙走得还比较近。《罗瑞卿传》在述及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前夕总参党委一位负责人向贺龙反映，指罗是已靠边站的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的后台，被贺否定，又问贺“现在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问题？”时，“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这位负责人问贺龙：‘您这个话能不能传达？’贺龙答：‘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¹

《罗瑞卿传》没有也不会提及的是，上海会议召开以后，贺龙一旦知道毛泽东抛弃了罗，其对罗的态度也有了180°的变化。根据唐平铸工作笔记，贺在1966年2月至4月间对罗有过两次批评，其一为贺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暗情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26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其二仅为一句话：“这个人没有改造的人。”

因为曾经走得比较近，贺龙对罗的家庭情况，包括有多少电话机子，有多少枪枝，均十分知情。一旦知道毛的态度，贺对罗的揭发批判也是十分无情的，甚至疑神疑鬼地“提醒”有关方面“要防止暗杀”，“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贺龙的过度反应，今天回头再看只觉十分搞笑，惟此恰恰反映了贺当日急于要与罗瑞卿政治上划清界线的迫切心态。■ （2018年6月）

¹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39。

附录：

唐平铸记录的中央、军委领导人讲话

以下是全文照录的唐平铸工作记录本中的中央、军委领导人讲话。记录中个别难以辨认的文字，用△号表示。笔者对讲话中部分需要说明的内容，作了力所能及的简要注释。

三月一日

林总¹说：

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它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这个人背过两支枪，很厉害，很会钻空子。

萧主任²：

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和立场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他讲得不对头，可以插话。几个主要发言，其他同志可以补充。有些可以从正面说明，有些可以从反面说明。

叶副主席³：

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⁴撑着。

¹ 指林彪，下同。

² 指萧华，下同。

³ 指叶剑英。

⁴ 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萧¹四个人经常去。

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杨²。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³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去年二十二号说的）主席问许世友有多少兵，答有五十万。靠不住得，营以上干部靠不住得，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人家把主席、刘主席暗杀了怎么办？什么人看林总，什么人哭了，他都知道。

主席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康生你怕的三个人，你说对了（饶、罗）。他对特务老婆⁴讲，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解放以后又和她见面了。（在南京市当小学教员）罗什么△△问题不向林报告。名单、领导小组、执行小组，三个步骤都是主席批准的。要产生一个决议。罗就是个人独断，从当总参谋长来未向我单独作过请示报告（林说他从来没有作过创造性的建议，都是吃现成饭）（罗说黄埔军官学校只培养了两个学生，一个林彪，一个罗）虐待公务员，罗搞这一套，总有几个人在一起，与外国的关系有些可疑。

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¹ 刘指刘亚楼，萧指萧向荣，杨、杨所指未详。

² 指杨成武。

³ 高饶，指高岗、饶漱石，下同。

⁴ 指罗瑞卿延安时期的前妻拱平。

叶帅说，战略上藐视，是纸老虎，战术上重视，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很利害的，还是有联系的。就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画一条线。

总理说，罗的问题是阶级问题，党性问题，本质问题。

贺总¹说，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暗情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26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

聂总²，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他△△△△，△△△△△，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会完全拥护中央、主席、林总。

陈老总³说，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伸手。

刘总⁴，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徐⁵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林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2.8

林⁶说，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

¹ 指贺龙。

² 指聂荣臻。

³ 指陈毅。

⁴ 指刘伯承。

⁵ 指徐向前。

⁶ 指林彪。

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¹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

贺³讲：这个人没有改造的人。

总理说他个人特殊突出，他不承认，第三天找他谈话时，又说我有个人突出，没有个人主义，说了就不承认。

这次几条线，不要扯其它同志。与其它同志对突出政治的认识分清，不扯小事情。刘⁴的问题也不要扯宽了。这次就是打歼灭战，军队以外的事情也不要扯。

叶⁵：要把情况搞清楚，认识他的本质。我们批判谭⁶的时候，批判他地主父亲，罗对地主家很△△，三鞠躬。

一月四日

¹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² 指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批罗时指称罗虐待段。

³ 指贺龙。

⁴ 指刘亚楼。

⁵ 指叶剑英，下同。

6 指调政

小平¹: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 42 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罗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

¹ 指邓小平。

² 指谢富治。

³ 指陶铸。

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42个人说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不花很多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¹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八万言书搞全部推翻，彭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后分配工作，还分辩一些意见，△△△你保留你的，我们保留我们的。王明每年写几篇文章骂我们。

42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萧、杨、王、廖、刘共七个人²。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

已经发了十个文件，看一看。开始有些同志讲一讲，领个头，然后罗讲一讲，停一两天。两面的意见提出来，大家好议。

叶：会议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我们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向罗提出意见，不△△是对罗、对军队同志有长远的教育意义。主要抓大的问题，枝节问题扬弃掉。这个问题解决，对罗是教育，对我们建军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对全党全军的意义。希望罗真诚地站在党的利益上来，我们不是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恩怨，要抓住原则的方针。

¹ 指彭德怀。

² 应指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七人。

彭真：

关于萧苏¹的问题，与主席交换了意见。海军工作是有缺点的，这几年有改进，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另一个范畴问题。萧是个好同志，工作中有问题也是另外问题。苏是好同志，彭黄问题是站在中央方面的。苏与罗不是一个问题，工作问题是另外的问题，海军的工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林商量过。

刘亚楼的问题，从一生来看，是坚决执行主席的路线的。个人毛病相当大，后来有一段罗、刘之间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度受了骗上了当，最后向党报告。空军工作总的是好的，也要一分为二。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上海△△△△比较多，供大家参考。

萧主任：

事实提得差不多了，可以从理论上认识。

△拥护，61年以前就错误，62年暴露得更厉害，过上十年八年再搞就不得了。

几年来军队建设的成就、成绩很大。各个方面。

64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罗擅自决定大比武，方向性错误，否定四个第一和决议，这是唱对台戏，违背主席建军思想与建军的方向，严重的恶果。不是林总抓得早，可能把老本钱搞掉了，刮了半年。

- (1) 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工作的地位，党和军队的关系，引用主席的话。
- (2) 林提出突出政治以后，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对抗突出政治，打着红旗反红旗。
- (3) 在政治上思想上，文艺对主席思想抵制，反对主席的思想。十无论。
- (4) 无组织无纪律，封锁林总，打击元帅，搞个人批示。
- (5) 个人突出，唯我独尊，不得人心，抢功，干部问题上有宗派情绪。对干部打击报复，对一些无话不说，发展到反对林总。

¹ 萧苏，萧指萧劲光，苏指苏振华。

权威很大还不够，想篡军。面目全部暴露出来，林对他忍了又忍。

罗搞两面手法，又打又拉，伪装得很好。

比彭¹危险。彭臭名远扬。他打的是红旗，很多人怕他。

罗指向林总，指向毛主席。对着整个党。

错误的根源。

(1) 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老根未挖掉，对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地主意识没有改造好，对段光富，地主△△思想没有改造，暴露发展。

(2) 历史上也是犯错误的，作战、连队工作经验不多，在王明路线时期，执行王明路线，保卫工作搞神秘主义，搞十人团，脱离群众。高饶时期也陷进去了，与彭有矛盾，但有合作的。谭²的错误不相信，揭出来以后又抢功，投机，哪里有利，从哪里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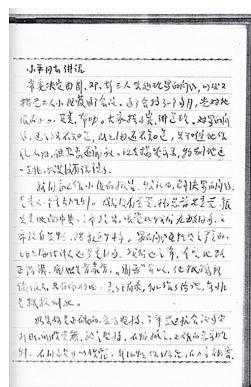
(3) 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危险分子。

(4) 思想方法是实用主义，对个人有利的就拿过来，不利的就反对。

罗没有什么本事，既无战略△△，又无战术△△，既不调查，又无创造，还反对十二条，搞四三△，搞大杂烩。

小平同志讲话：



常委决定由周、邓、彭三人来处理罗的问题，以后又指定三人小组管这个会议。这个会搞了一个多月，党对他很耐心，负责，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

¹ 指彭德怀。

² 指谭政。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邓小平讲话纪录)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底。

如果你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主席受过机会主义多次打击，开除党籍，就是坚持，不怕孤立，正确的总要胜利。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彭德怀作了结论，几万言翻案，还分配工作，主席对他说，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所谓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记性又好，伸了一下舌头也记几年，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狂妄的程度。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也经常犯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有时有主观主义，片面性，通过党的生活改正就行了。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

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当然，伸手不是天天伸。高不在陕北伸，也不在东北伸，而是当了国家副主席后伸，把总理、少奇要当挡路人搞掉。彭也是这样。在我们党困难的时候伸。罗也是到了气候才伸。首先伸向军队，挡路的是林总，逼林总让位，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大家揭发的事实，可能有个别有出入，但无伤对罗这个人的评价和对他问题性质的确定。有点出入无关，十件八件也不要紧。自杀本身就作了结论。

对罗的问题，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还是掌握在这些老家伙手里。△我们在当大权。党内一般性错误总是常有的，但有了彭高饶△的事件，又有了罗的事件，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第一是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断革命，不断自我改造，是我们一辈子的任务，到烧骨灰为止。每个人有了这个觉悟，犯了错误容易纠正，小错不致铸成大错。

第二. 学会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都是班长、副班长，不要搞一言堂。党内民主对个人是个监督。高级干部就要靠党的委员会，支部小组管不住。重大问题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可以少犯错误。要搞党的生活会议，洗洗灰尘，搞批评自我批评，坚持这个作风，对我们和后代都有好处，教育我们的接班人。这对罗没有作用，对别人有作用，我们应当有这个觉悟，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1949年全国胜利以后，就是不断的阶级斗争。我们有些事情犯错误就是犯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无例外的，哪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进行。党政军民、文史经哲都在搞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死心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在党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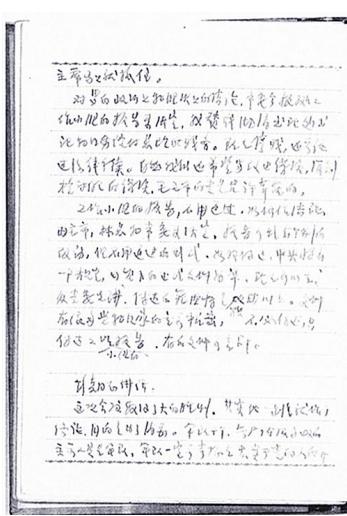
反映，忽视了这个方面，就必然要犯错误。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常委会根据工作小组的报告来决定。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现在停职，还要经过法律手续。自然我们还希望罗改正错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的党是允许革命的。

工作小组的报告，不用通过。如何作结论，由主席、林总和常委来决定。报告可能有个别的改动，但不用通过的形式。如何传达，中央将有一个规定，以发下的正式文件为准。现在可以在高级党委先讲，传达的范围将是县团以上。文件有很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必传达，只传达工作小组的报告，有的文件可重印。

彭真同志讲话：



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行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

(邓小平与彭真讲话记录)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甩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

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这是政治上的试金石，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总是危险的，会犯错误的。社会和革命是不断前进，不是不断改造自己，就会犯错误。

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千万不要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个癌症，不仅危害党的事业，也害了自己。过去对罗有些察觉，但没有那高的觉悟，没有看出来。“十无”对我不满，总以为他可以渐渐改过来。有了个人主义，什么人就不信，多少有点个人打算，就会给党造成危害。

一定要守纪律，特别是高级干部靠谁来监督，如果不守纪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那是极危险的。有话要在桌面上讲，讲错了，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要鬼鬼祟祟，搞这搞那，罗喜欢听小话，不走正路，搞阴谋，搞地下活动。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搞地下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纠正，林总在1960年以来就批评过他多次，他不听，有意见也不对总理、总书记讲。走小路，走邪路，阳奉阴违，最后还是害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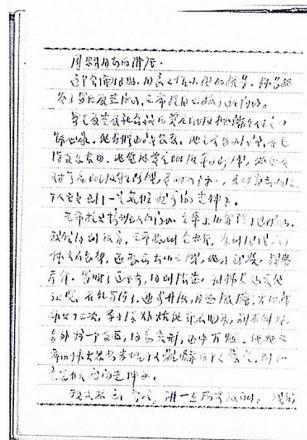
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党有主席领导，有最高的权威。我们每个干部的权力都很大，不搞民主集中制，乱子总是会出的。我们后一代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敌人容易钻空子，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不可分的。是否走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民主作风主要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管怎么刺耳，凡是正确的，都要接受，罗就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林总正确的指示也听不进去，还有什么组织纪律？

胜利以后党内出了不少问题。六年一次，有点偶然性，也是必然的，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百年，几百年都会有。罗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赫鲁晓夫、铁托……都是资产阶级的。吴晗这个人是反党的，我和老虎在一块睡觉，也未察觉。阶级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

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



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

主席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在车上同罗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到教育。主席想到全世界，想到后代，是个伟大的思想，还想出大小三线、地方武装、战略方针。罗听到了这五条，得到

(周恩来讲话记录)法宝，到林总处要他让贤，不能等待了，逐步升级，自然流露。大比武外出十三次，原子弹爆炸他都不回来，别有所好。另外搞一个东西，得意忘形，正中下怀。他把主席的伟大思想当作个人肮脏的个人欲望，到了一定气候就向党伸手。

我支持这个会议，讲一点历史教训。我们党生于忧患，多事之秋，不是太平的。不仅帝反修阶级敌人包围我们，也在考验我们。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初期，对自然力、天灾、地灾，我们都还在摸规律，这些都是好事，都对我们是考验。主席引用过一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无论对阶级敌人，还是对自然敌人，我们都是在“备战”，都在战斗。

我们党犯过两次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前后十二年，党还是战胜了，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五次错误中，我在最后两次负有很大责任。武汉时期也有责任，受到教育。党在胜利中前进，在错误中受到教育。使我们认识了领袖。遵义会议，整风，七大，从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胜利，错误不会影响我们前进。人民要革命，总会出现正确的路线，出现党的领袖。王明、张闻天这些人是反党的，我们党涌现了领袖毛主席。

我们党有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党的经验更丰富了。

我们党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时，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王明武汉时期就是这样。这个教训对兄弟党也是很大的，如对印尼。三次左倾路线是党处在困难时期，盲动、立三、王明路线，这是与资产阶级决裂时产生的，这也是教训。

党在困难时有一部分人搞宗派，1928年托陈取消派，搞分裂主义。立三路线以后，罗章龙搞右派中央，过雪山草地时张国焘分裂党，成立伪中央。张国焘叛党，走掉一个人，连警卫员也不跟他。野心家搞宗派活动，分裂党，党不能前进吗？相反，党更加巩固强大了。五次路线错误，三次分裂活动党都渡过了，涌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丰富了党的思想和经验，坚定地保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是当代伟大的领袖。

不但是胜利，错误也从反面论证了主席的正确性，主席、少奇、小平同志都受过打击，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林总跟主席跟得很紧，有许多发挥，罗都要伸手。

解放后六年一次，高饶、彭黄张习¹、罗。当时搞宪法，高想当部长会议主席，夺权。主席要到第二线，少奇到第一线，他就向党伸手（53年）。彭黄是在党遇到困难，总理不在他话下，直接与主席较量。59年周游列国回来，庐山会议，时机到了就伸手。这次是在64年，主席讲了接班人，罗得意忘形，他就伸手了。他对林总是敌对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党。

解放后是三次。这次是革命力量大发展，帝反修要挣扎，结合在一起。这个斗争要看长不看短，要看大不看小。主席讲大小三线，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质变。在“遗嘱”中要老婆孩子相信党，自己却不相信。自杀是反党行为，两封信就是反党。党是很信任他的，给他很高很大的职务。常委有责任。我们接触多，没有察觉出来。彭德怀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证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双脚下地是不是自杀，还要继续考查。

解放后全国胜利了，是不是天下太平了？罗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阶级斗争在各方面都

¹ 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习仲勋。

反映出来。党揭露了这个隐患，是一个大胜利。上海会议时，他在云南，担心他跑掉了。主席说跑了算了。任何人在党领导下做点事，都是靠党的威信，主席的威信，人民的信任。如果离开了党、离开了主席、离开了人民，就一无所成。

现在要消毒，搞一个文件。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教训，大家要来防止修正主义，引以为戒。我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对罗没有察觉，要提高警惕性。当然也不可神经过敏，无中生有。出身好，也会沾染坏的东西。出身不好的，更要肃清影响。有些人不说，不能互相帮助。要时刻想到自己的历史和阶级。罗并不是一贯正确，过去他是吹的。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四句话要严肃对待。学到老，改造到老，改造到死。人的晚节可贵，不管革命几十年，最重要的是几十年如一日。晚节可贵，这是最难最难的。一想到这，就不能骄傲。想到农民的生活，自己就很难过，我们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好。要时时提醒自己，鞭策自己。今后还可能发生问题，发生少一些，小一些，不要把问题搞得很大，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

【评论】

无“芯”岂能恋战？

——从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停映下架谈起

何與懷

一、爱国老四的困惑

日前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是说隔壁老四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被中美贸易战的消息和评论搞得许多天睡不着觉。对于他一个时刻准备消灭美国帝国主义的爱国群众来说，有几个问题没搞懂，老在脑里反复琢磨：

第一、既然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为什么还要抗议、反制呢？美国砸自己脚，难道我们不应该高兴？不应该乐见其成？

第二、中国商务部警告美国悬崖勒马。美国既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我们为什么不一脚踹他们下悬崖，反而要他们悬崖勒马？

第三、既然美国打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为什么还要苦口婆心规劝他们？

第四、新闻说美国要打贸易战，我们奉陪到底，既然砸的是美国的脚，损害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为什么非要奉陪而且到底？不奉陪美国敢把我们怎么办？

贸易战是大学问，特别是涉及到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一般的时刻准备消灭美国帝国主义的爱国群众，还真的不得不像老四一样，难以搞懂。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也许可以稍微让人开开窍。

二、为什么中宣部叫停《厉害了，我的国》

4月19日，中宣部紧急叫停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的播出和放映。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等中国各大视频网站都收到指令，将其下架，全国各大城市电影院也停映该片。

这一突如其来的指令迅速在网上引起莫大喧哗。

今年3月2日，为了配合中国两会，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隆重登场。这当然是政治任务，绝对不可怠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通知，各电影院“须在上午、下午各有一场场次排映，绝对不允许幽灵场、午夜场、凌晨场现象出现”。该通知还要求各影院与当地企事业等相关单位联系包场事宜。为何如此重视？官方讲了，该片要展现的是过去五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该片“不仅记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还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引领人们走向新

时代的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官方要让这部歌颂习总书记的纪录片追赶上电影《战狼2》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据称该片已累计票房4.7亿人民币，不仅是中国首部票房破两亿的纪录片，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纪录片票房冠军。当然了，这绝对不是钱的问题：这部片子让许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极度膨胀，一时间，人人热血沸腾，傲视四海，好像称霸世界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

奇怪的是，几天前的4月10日，中国广电总局责令永久关闭拥有过亿段友的娱乐软件“内涵段子”，罪过是“低俗”；那么，绝对“高大上”的《厉害了，我的国》，怎么也遭全网停播了呢？

要解开这似乎扑朔迷离的谜团，或者先要应急科普一下，要认识芯片在当今高科技中的至关重要性。“芯”，如果去掉那个草字头，你就懂得：人如果无心，肯定是死人；电子产品如果没有芯片，就是一堆废料。然后，再把自我陶醉而朦胧的醉眼睁大一些，就会看到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的中兴通讯这些天如何焦头烂额。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拒绝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销售芯片等一切产品，时间长达七年，禁令立即生效，将依赖美国芯片的中兴送上末路。而且，由于连带拖累，华为、联想、阿里巴巴……遭遇“毒手”也极有可能。这一下子，引发一大批中资高科技产业恐慌，也一下子暴露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原来“号称中国的民族品牌，其实都隐藏着一颗美国芯”。此刻，再拿《厉害了，我的国》显摆，大肆自吹自擂中国如何高科技如何领先世界，不说成为世人笑柄，起码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更要命的是，有人指出，这部被形容为“传递中国力量”之作里面有大量技术细节，可能会被欧美进一步分析，坐实是盗用、偷窃、强制技术转移的欧美技术。先前还洋洋自得，岂料已是自我提供了作案证据。

“厉害了，我的国”，多么霸气！这本来是其炮制者的大制作，大部署，大宣传，大成果，就好像是毛时期“大灭帝修反的威风”的伟大创举。该片停播，肯定让他们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大敌当前，不得不暂时退让一步了。

无“芯”岂能恋战？！不可一世的大国幻象被小小的芯片击灭。

三、各路“爱国”英雄的出色表演

不过，当下还有各路英雄，各有出色“爱国”表演，不妨一表。

首先是当事人中兴。4月20日，中兴举行了1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董事长殷一民领着一众高管出席。他们明目张胆一而再再而三违反合约，被美方抓个正着，人赃俱获，诚信尽丧，却没有道歉认错，而是说什么“美方将细微的问题无限扩大化……”，好像要显示中国特色。进而，混淆公司、民众、国家，上纲上线，说什么“身后有强大的祖国和十三亿人民”。这时候上升到国家角度，对国家其实不好；这时候扯出民众来，也无济于事。是否要死大家一块死？或者要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中？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一直以厉害国代言人自居。4月17日深夜，发布了一条微博，呼吁国人“一定要力挺中兴，力挺华为”，动情地强调“今夜我们都是中兴人”。细心的网友发现，胡锡进是用苹果的iPhone7plus发的这条微博。人们调侃，用着美国货号召国人在贸易战中和美国对抗，多少有点讽刺。早些天，他让《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系列《对贸易战奉陪到底》《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等“战狼派”言论，说认怂就是汉奸，鼓吹以战止战，要发扬抗美援朝精神，奉陪到底，打到中美不做生意。孙立平教授发文直斥：“冷静地想想有关的问题吧。不然，在那抱着苹果手机，喊著今夜我是中兴人，有个屁用？！”

那位曾被中宣部吹捧的所谓思想家、战略家、文学家周小平同志，在中兴事件当口，当然也义不容辞，连发两文，果然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出人意表地高声欢呼“重大利好”。何来“重大利好”？他学着毛祖当年的口吻，说：“美国终于对华封杀芯片出口，自主研发的春天来了。”只是这次，著名意见领袖的意见好像也不怎么合乎时宜，马上遭到《人民日报》打脸。人们讽刺道，这位周姓青年同志对中兴事件如此欢呼雀跃，信心十足，一定对超英赶美成竹在胸，不然不会这样忽悠人不偿命的。

人们还想到那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他最新的一份研究成果可谓学术性的《厉害了，我的国》，一时间激发举国上下极度兴奋，特别是让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亢奋不已，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他斩钉截铁宣称，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而且，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胡教授的判断可以上达天听，影响国策。当此民族品牌生死存亡之秋，有人建议中兴公司务必三顾茅庐，向胡教授虚心求教，请他指点迷津。

还有一位高人，有人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他就是全真派梁兴扬道长。据说去年梁道长在南海贴了一道符，致使美军舰船接二连三发生事故。又说他最近慈心难忍，愤笔写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镇”符篆一道，帖在美国地图之上，毅然要为国申冤，惩恶扬善。这位法力无边之人，中兴公司岂能遗漏？届时，他可以联合浙江大学炼成“孔圣枕中丹”的那批科技精英，定将研发出让拥有者另有一番羽化登仙、天人合一之感的中国芯。

四、外行张召忠的质问

当年上电视预测伊拉克战局进展让全国大大娱乐一番的张召忠将军局座这次比较接地气。他论述了一通芯片如何如何重要，质问为什么中国不早早布局自行研发？他对此进行严厉批判了，虽然是马后炮。不过这位将军的马后炮也打得不准。他毕竟是外行，没有深入了解科技界的黑幕。中国芯片研制许多年前就进行了，可惜，有关官员的“官品”、有关科技人员的“人品”、有关公司的“司品”，都有问题。2002年，不是就有陈进院长搞出轰动国际的“汉芯一号”大骗局吗？

人们悲愤发问：这些年来，砸向中国芯片研发的万亿经费去了哪儿？说到底，还不是一个体制问题！

（此文在《纵览中国》2018年4月22日首发，本刊加了小标题，并有删节）

【怀人】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再究一代船王卢作孚之死

王晓林

2017年2月8日，是卢作孚先生自戕离世65周年忌日。此文标题取自黄炎培在卢作孚死后36天所做哀辞，原句结尾为惊叹号，全辞却以“几十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间诸水之滨”结尾，辞作者满腹的纠结和狐疑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65年的光阴中。许多人尝试做这个“欲之君者”，我不过其中之一，且索性斗胆把“问”字化作问号放在标题上。先请黄任老原谅。

我的祖父王庭枢是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老员工，毕业于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专科，是一名会计师，多年供职于汉口美孚煤油总公司。1938年武汉沦陷，他带着全家老小逃难来到陪都重庆，被卢作孚揽入麾下，供职于民生公司财务处会计科，员工资格为第2276号。1943年升任会计科副科长，1944年卢作孚亲笔签署任命他为会计科主任，几天后，又颁布了祖父财务处视察的任职和加薪令，且行文不吝褒扬：

“本处会计科副主任王庭枢请予升职加薪案 查王庭枢君于廿八年二月入公司服务迄今五年有余，卓著勤劳，业已商得总经理许可并高得总务处同意，拟请以提升为财务处视察，并加薪一级 经卢总经理许可 1. 批准改任为视察 2. 月薪核加为贰佰捌拾元 3. 基津贰千陆佰元 4. 从十月份起支 九月. 廿七日

照加 作孚 三三. 九. 廿九”

卢先生对祖父的知遇之恩，连70多年后的我都感同身受。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作为一位大实业家，一代船王，50岁出头的卢

作孚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期，“每一个毛孔”都喷薄着创新的激情。在出席纽约国际通商会议后，他和他的民生公司做出了全力扩张中国水运业的决定，并于1946年成功获得国民政府和加拿大政府联合担保，向加拿大三家大银行——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和自治领银行贷款1275万加元，自筹225万，在该国两家造船厂营造新船以及改装低价购买的美军二战剩余物资——扫雷艇、巨型坦克艇登陆艇、油轮、驳船，大拖轮等，用于战后中国的内河及近海航运。当年，祖父被卢作孚派往加拿大和美国，执掌贷款、购买和监造中的会计事务。

在那个改朝换代的年头，因为船只还未全部到手，祖父又奉卢先生重托，在其他驻美加人员纷纷回国或自谋生路之际坚守异国，出任民生公司驻纽约办事处主任，继续着船只监造和商务处理的收尾。1951年，44岁的祖父冒着生命的危险，靠了十几名海盗般要钱不要命的挪威籍海员，拖驾着用美军二战剩余物资改装而成、只能用于内河与沿海和若干无动力船只，居然平安横穿巴拿马运河，越过极不太平的太平洋，于4月下旬驶抵香港，人船平安。

这一段历史，除了全家的集体记忆，找不到任何史料的支持，卢作孚研究学者们也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951年正是冷战最热之际，西方对中国已经全面经济封锁，船队怎么可能从太平洋上直接开回来呢？要弄个水落石出，除非到纽约或魁北克港务局查询出港记录，或者到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查询过路缴费凭证，可那都是70年前的记录，困难可想而知。2009年我发电邮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请求帮助，因难度太大无果。之所以在这里敢把这个细节战战兢兢地写出来，除了坚信祖父的人格，他绝不会生生造出“海盗一样”、“要钱不要命”、“挪威籍船员”……这些指向极为明确的词组之外，最重要的支撑来自2010年一位“卢学”研究者告诉我，一位还健在的“老民生”王创伟先生曾说出过同样的传奇。当年只有18岁，在民生公司香港办事处做茶房的他，曾亲身到九龙油麻地码头接到过跨洋回来的船队和“王庭枢先生”。事隔60多年，身居广州的耄耋老人，在听到王庭枢的名字时仍是激动不已。

诡异的收买灭口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卢作孚之死死于他和他的企业无法承受的战祸、乱象、资金链的断裂以及“肃反镇反”、“三反五反”的重压，而贴身通讯员关怀的恩将仇报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一个更离奇的传说——卢死于一个重大的疏忽：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忘记”告诉他的总经理，新政权已经批准向民生公司放贷1000亿（旧币），导致一生以诚信为本的大商人卢作孚因面临失信的绝境而弃生。

仅仅出于常识，我就无法接受这个显然的谬说。

且不论童先生奇迹般“猛然想起1000亿”的行为居然发生在卢作孚死后的第三天，也不论多少“卢学”研究者都没有找到民生传达室曾收到过这份“1000亿”电报的记录，仅仅从一份祖父王庭枢的档案，就足以推翻这套无稽之谈。档案里有两份东西十分刺眼：第一份，1951年6月5日，中国海员会民生大厦委员会向民生公司，也就是向总经理发出了一份照会，全文如下：

“顷经我会会员群众反映，公司在目前未全面解决人事薪级制度时，竟对财务处王庭枢作单独调整薪津的措施，此种不合理现象，影响我会员弟兄生产情绪，兹特提出严重抗议如下：

一. 财务处及人事室在分公司未合理解决全面人事薪级问题时竟对王庭枢作个别调整薪津

之举，显系有意破坏公司整个人事薪级制度。

二. 由于王庭枢的单独加薪，为会员弟兄群起仿效，以王为例，使工会处理困难，这样必然会影响生产情绪，造成工人与工会间的摩擦，是财务处与人事室存心分化我工会与工人间的团结。

三. 王庭枢掌管纽约及加拿大账目，迄今尚在清理，在国外既拿津贴，国内又拿薪水，已属特殊待遇，现有突然增加底薪达一百元之多，显有收买灭口之嫌。

四. 立即注销王庭枢单独加薪案（应退回四、五月份补薪），并追究责任，否则发生任何后果一切责任应由公司负担。

五. 财务处及人事室负责人应做检讨并公开答复。

此致 民生实业公司 1951年6月5日”

这篇像极了文革式最后通牒的行文中，“收买灭口”四字令人疑云顿起——谁要收买祖父、要灭他的什么口？再看第二份摘录：

“……至于纽约及加拿大账目尚在清理期中，如有错误也难逃群众雪亮的目光之下，非收买王庭枢一人所能掩护了事……。”

怪了，卢作孚仅仅是要祖父在项目收盘时拿出一本正常的账目来，怎么就成了“收买灭口”？不假，祖父刚刚回国，公司就单独针对他颁布了加薪令，且起支日期从他尚未登岸香港就开始了。他为民生公司立了大功，如果说他雇用的那十几名海盗一样的挪威籍船员是拿命换钱，那么拿命为民生公司拖回一个船队的祖父，涨点薪何错之有？可伴随这次“单独加薪”，公司同时发出了调遣令——他由出国前的会计科长升任总财务处经理室主任，任务只有一个：清理国外账务。这就有点不妙了。

说到王庭枢和民生美、加办事处的任务，只有简简单单两个——向银行借钱、到造船厂花钱。在一个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工商文明环境下，它是一笔“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明细账，有了明细账，借贷双方可以协商、折冲而不是单方毁约或者更有甚者，赖账。大商人卢作孚一定也是这样想的。这才有了1951年4月，祖父在香港甫一靠岸，公司就发布了调遣单：“王庭枢即日任职财务处经理室主任，主持清理国外账务”。

是时祖父人在汉口。当年一大家人由重庆迁回汉口老家，顾不上护送就只身飞赴魁北克，五年未回过家的他正和家人短暂地小团圆。不料8月26日卢作孚亲笔写下急调令：

“调王庭枢到总管理处财务处办理债权债务清理工作。财务处会计科工作。

作孚 八.廿六”

字迹和涂抹都很凌乱，划掉的字倒更像是关键字。4天后，公司资产负债清理小组又发了一条调令：

“兹因本公司债权债务工作亟待完成，拟调渝分公司秘书科职员王庭枢办理是项工作，
务于9月1日始前来本组办公。即布

民生实业公司资产负债清理小组启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

后面还有两行疑似卢作孚的粗体批示：“请傑兄联络。已调，催速到职”

和4个月前的调遣单相比，1.当事人的职位前者高后者低；2.当事人的职责前者具体后者笼统。且不论4个月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二连三的调令充满紧张感是显然的。

此时祖父的处境已经非常尴尬——4月开始的加薪，在海员工会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下实行了仅仅两个月，到了6月，不但加薪令被撤销，还要求他退回了2个月的薪差，并写下“犯下绝大错误并自动退薪”的自贱书。从后一份调令看，他根本不是什么“总管理处财务处经理室主任”而是“渝分公司秘书科职员”，王庭枢连一天也没有在总财务处经理室主任的位置上履过职。

在公司“十二道金牌”的急令下，他从汉口赶赴重庆。个人薪津多少、职位高低事小，公司账目、民生信誉事大，士为知己者死，仅仅为了卢先生他也忍了、认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祖父一到重庆，几乎是从朝天门码头就被直接拖进了上千人的会场。我那绅士派头十足，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祖父被揪住头发，拳打脚踢，像一只皮球，从会场的一端踢向另一端，从一只拳头下抛向另一只拳头。他们管他叫“洋老虎”，他们管这种“游戏”

叫“打排球”！这就是我家几代人都知道的“打排球”典故，一个残酷而屈辱的符号。他被殴打，显然不是因为他“国外债权债务”清理得不好，“革命群众”也根本就没有给他清账的时间，当年末他就被遣回了汉口老家。他确实被封了口，这一封，就是一生。

一份本可不签的“抵押合同”

用加拿大三家银行贷款（以下简称加贷）建造的9艘客轮（以下简称加贷轮）——虎门、玉门、雁门、祁门、龙门、剑门、石门、夔门、荆门号，原是按照卢作孚近乎浪漫的理想——“促起世界上的人都到四川来，或来考察，或来游历。使世界上的科学家都到四川来，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的金融界或实业界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卢作孚《未来的四川》而设计制造的。美国报刊曾这样形容民生公司的客轮——“尽管卢家的餐桌上只有陶碗竹筷，但在他的新船头等舱里却陈设着谢菲尔德的刀叉、柏林的磁具、布拉格的玻璃器皿”《亚洲和美国》1944年6月号。现在民生又有了“门字轮”计划，卢作孚的理想就是用这等交通工具为世界打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中国西南大门，为芙蓉天府四川打开世界之窗。他陶醉于这个计划，称之为“公司最大的成就”¹¹³¹。它是他的中国梦。

可现实与理想总是天敌般相背。加贷的重负几乎从借到手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困扰卢作孚——为抗战牺牲惨重的民生公司战后得到的国民政府补助寥寥无几，胜利后的复原运输又因内战惨遭重创，尤其是政权更迭后民营企业几无生存空间的困窘，这些都远超出了借贷时对最难境况的估计。还有那需要自筹的225万加元，官价和黑市价竟相差17亿法币。为了民生自诞生那天起就坚持的“无官股”底线，卢作孚坚拒了蒋介石由政府按官价投资法币折合外汇的提议，在黑市以高价购入美元完成了自筹¹⁰⁰⁷……有一条合同常用语叫做“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例如战争、政变、暴乱、罢工等等，几乎全让卢作孚遭遇了。

加贷付息自1949始，每季度需付9.5万加元。是年政权更迭，江山易手，民生不得不卖掉若干固定资产加上先向旧政权中央银行、后向新政权中国银行借款，付清了1949年全

年和 1950 年第一季的利息^{1124、1166、1179}。就在这时，一件有悖商业常理的事情发生了：在借方完全没有违约的情况下，1950 年 3 月 10 日，借贷双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关于滞港的 7 艘新轮抵押合同》。

时至 1949 年底，9 艘加贷新船已全部自航回国并陆续有了收益。除 2 艘 1948 年秋由上海进入长江，开始承运长江内河客运外，其余 7 艘暂栖香港，不排除卢作孚对新政权的观望之意。他果断成立了民生香港公司，开辟香港至广州、澳门和江门航线，新船门字轮都运营起来，客货兼运。发展海洋运输本就是卢作孚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景，现在更是需要依此赚取外汇支付加拿大借款本息。包括 7 艘门字轮在内的民生船不定期航行于东南亚各大港口——西贡、基隆、曼谷、新加坡、雅加达、仰光……最远能到加尔各答。香港公司资产已超过 2000 万美元，这当然包含了 7 艘加贷船的价值。

在民生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把这 7 艘加贷船抵押给银行，虽然有悖“借方不违约贷方不能强求在正本合同外另行签署有利于己方的合同或条款”的商业常理，但是换来了这些船只可以悬挂加拿大国旗的法律允诺。是时中国政局非常混乱，北京新政权与重庆旧政权还在对峙，船只无论是悬挂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旗都十分危险。加之国民政府担保明显动摇，还本期即将开始，假如此时借方稍有赖账或者脱身之意，拒签或拖延签订这份抵押合同才是上策。但是偏偏在这个当口，合同被签订了。

加贷名义上是两国政府联合担保，但谁都明白实际抵押物只有“卢作孚”三个字，为这三个字“作保”的则是这样一串名字——梁漱溟、张澜、黄炎培、林语堂、章乃器、晏阳初、胡适……还有支持中国“乡建派”的美国和加拿大友人。民生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签订的与其说是一纸商业合同，倒不如说是一份双赢的道义契约——二战后的加拿大经济严重衰退，国会在 1944 年通过了《输出信用保险法案》，鼓励外国向加借款并在加订购工业和交通用品，由政府向承借银行担保，如遇风险由加政府承担，以盘活资本，增加就业。民生公司这笔借贷完全符合法案要求，因此没有通常的借贷抵押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反倒正是这份补签的抵押合同，把有情有义的道义之约变成了冷冰冰的商业之契。

其实在1946年签约之初，甲方民生公司已将期货——全部9艘新船抵押给了国民政府，且“在借款未还清之前民生公司不能设定任何权利或转移”^{1013、1030}。时至1950年，虽然国民政府还没有正式撤销担保（国府行政院本年10月还由穗迁渝办公），但卢作孚凭着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对其不抱希望。他必须找到新的担保人才能保住信誉保住船。

还本付息的日子说到就到了。根据合同，自1951年6月始，民生每年须还本息共计165.75万加元，与仅仅付息相比，款项之巨非同小可。1950年春，加拿大外交国务秘书皮尔逊在香港约见卢作孚就已发出预警：若民生公司在国民政府撤保情况下无法还本付息，那么作为担保人之一的加拿大政府就要全额赔偿银行损失。这样的结果加拿大纳税人不会答应，议会也将对政府不信任。赵晓玲《卢作孚的选择》P94

一生视守约如性命的卢作孚，为了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守约，终于违背了他坚持一生并因此而开罪过孔祥熙、严防过宋子文、婉拒过蒋介石的“不允许政府经由官股渗入进而控制‘能够由人民经营并管理其盈亏成败’的事业”《卢作孚文集》的原则，为了一个基本的文明准则——契约准则，他走出了没有回头路的一步——要求公私合营，并且在此举之前签订了这份“抵押合同”。

一步险棋

请注意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1949年10月，身在香港的卢作孚指令民生上海分公司经理宗之琥第一次向新政权探询：如国民政府撤销加贷担保，人民政府能否接保¹¹⁴⁶；

11月再次请宗向北京转达自己一定回国，并请求新政权为加贷提供担保¹¹⁴⁷。据宗氏几十年后的文章说：“（新）政府同意支持利息偿付并在中加建交以后继续担保”宗之琥《我与民生公司》（按：此说堪称“三无”——无边际，无逻辑，无出处）；

1950年2月15日，新政权中财委明确拒绝为民生公司接替担保和还贷¹¹⁶⁰；

3月10日，民生公司与加拿大三家银行补签了抵押合同¹¹⁶²；

3月13日，中财委主任批示交通部长章伯钧，原则同意接替担保和借款还贷，章在批示上签“阅即办”¹¹⁶²；

3月24日，民生驻京代表何迺仁面见政务院总理，正式提出公私合营请求¹¹⁶⁸；

4月，政务院总理答应设法为民生实业公司偿付到期债务及为加拿大贷款担保¹¹⁷³；

6月，卢作孚到京，正式提出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使之渡过难关¹¹⁷⁸；

8月9日，中财委将与卢作孚就公私合营协商内容通报政务院总理并长江沿线——西南、中南、华东三大财委，同时作出极负面的、建议性的结论——“该公司负债几与资产约略相等……欠加本息，只能靠政府贷款来支付，公私合营对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包袱”¹¹⁸⁶；

8月10日，民生公司与交通部签订《公私合营协议书》¹¹⁸⁶；

卢作孚用公私合营换取了新政权对加贷接替担保及借款还贷的承诺，“抵押合同”是博弈的结果，也是最后的防线，防的就是万一承诺落空时借方的彻底失信。这是一步险棋，从工商文明角度看，这步棋走得毫无错处且光明磊落。加贷造船一案他是“授命全权大使”¹⁰³¹，为保住企业的信誉和财产，他有权相机行事。凭着几十年商场实战经验，卢作孚深信只要能在和平环境下有序竞争，加贷船不但足以还贷还一定会盈利。那么谁担责谁获利，文明法则，天经地义。我卢作孚不懂意识形态，也不管谁主沉浮，我只关心民生——我的公司民生和芸芸众生的民生。

比全国大规模的合营早了整整4年，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与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¹¹⁸⁶，他一片苦心都在这份协议书里了：

“……下列事项拟请人民政府酌情予以照顾：

甲、加拿大借款利息每三月一次，每次计加币9.5万元及1951年6月第一次还本，计加币127.5万元。在未能全部自筹时，请酌以贷借。

乙、前向中国银行所借偿付加拿大借款利息计港币100万元，及清理停泊香港船只费

用港币50万元，请酌予展期。”¹¹⁸⁹

在整部《协议书》中，这是作为私方的民生公司提出的唯一实质性条款。不，不是条款，是乞求。偿还加贷，无疑才是卢作孚最大诉求。他一厢情愿地企盼公私合营帮助他走出加贷困境。

从卢作孚的早年著述，特别是他1946年发表在民生自办刊物《新世界》（半月刊）上的《论中国战后建设》可以看出，他的治国理念曾经强烈倾向于计划经济并对苏联新经济政策大有好感，很有些“国家主义”的味道。彼时的他还没有看到纪德、罗素等西方著名学者在访苏归来后对苏俄共产主义从希望到失望、从憧憬到厌恶的一系列文章，更不可能看到大经济学家哈耶克刚刚面世的经济学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对计划经济无情的鞭笞。卢作孚毕竟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爱国的大实业家，他从很单纯的实业作用于富国强民的角度看待和期待着中国也走大计划经济之路。但是到了1950年，卢作孚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想主义色彩，公私合营对于他不是“计划经济理想的实现”，而是新政权留给他的唯一出路。这个残酷现实令向来习惯并热衷以文字表达观点的他对自民生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转捩点”——公私合营，竟无一字著述，仅仅在1950年11月6日的董事会上说：“公私合营过渡办法是从基本上解决公司的问题，是有效解决公司问题的办法”¹²⁰⁶。这也是后来新政府指责他“欠加本息，只能靠政府贷款来支付，公私合营对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包袱”¹¹⁸⁶的由来。可见此刻的公私合营无论对于卢作孚还是对于新政权都无关理想、主义、建国治国理念，而是一桩交易，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

就在这次董事会上，卢作孚就公司负债状况作了如下陈述：“本公司负债笔数并不多，除加拿大造船款外，其余债务可分为2-4年还清。偿债办法俟将债务清理后即可做决定”¹¹⁹³。可见除了加贷，他对其余债务的偿付是自信的。抵押上呕心沥血一生打造的民生公司，他此时此刻主动要求公私合营的第一目的，无疑是偿还加贷。民生公司的总资产远远大过加贷，仅仅香港民生就超过2000万美元，断无资不抵债之虞，公方肯定算得过来这个

账。多年后，长子卢国维还清楚记得父亲的话：“只要船还在，我就什么也不怕！”是的，抵押物在，债务人的信用就在，可若是抵押物不在了呢？

1951年初，加拿大副财长克拉克在渥太华约见王代表世均，正式发出警告——“今年民生公司对借款应该还本了，希望你们履行合同，以免增加我国政府的困难。”王世均《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经过》

因此1951年祖父王庭枢刚一回国，卢作孚即调他“清理国外账目”，8月末更是亲笔写下急调令，将他从汉口老家召回重庆主持清理加贷债务。《公私合营协议书》第三款第五条明确要求民生方提供“国内外债务详表及证件送请清理小组审核，重要之债务必须附具说明书”，加贷当然是最重要的债务，且“说明书”只能由王庭枢来写。

可奇怪的是祖父一到重庆就惨遭殴打和斗争，到死都没有写出这份“说明书”，这不能不让人满腹狐疑。王庭枢的罪名是被“收买”和“灭口”。倘若真有灭口，要“灭”的只能是这份“说明书”——加贷账目；倘若真有收买，要“收买”王庭枢的也只可能是他——卢作孚！可是为什么他还来不及被“收买灭口”，就已经作为“洋老虎”倒在人民一一海员工会民生大厦委员会众生的铁拳下了呢？有一种猜测——海员工会认定民生驻外机构贪污腐化，王庭枢是知情人，所以公司上层要对他收买和封口。可此说在逻辑上无法成立：1. 果真如此，海员工会一定会千方百计撬开他的嘴而不是打完“排球”很快就遣送他回了汉口老家“管训”；2. 果真如此，为什么直到十几年后中加要建交了，交通部才多次找到他问询？这未免有牛刀杀鸡、狗拿耗子之嫌。

王庭枢一回国就被“突击提干”、“突击涨薪”，除了他确为民生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外，不能排除卢作孚激励他迅速工作，尽快出账的可能。当年的卢作孚是准备拿着他认为祖父会很快厘出的、以资产与权益平衡关系作为记账基础、动态反应资金运动变化的现代会计方式做出的国外债务明细，先去和公家讨个“办法”的。

在手中没有“债务说明书”的境况下，卢作孚也竭尽全力去作了，上至国家政务院总理、西南军政长官，下至公股代表、工会群众，他一个一个地说服。据2014年新版《卢作孚年谱长编》统计，从1950年6月第一次进京和新政府接触，到1952年2月自戕，19个

月，500多天，卢作孚8次进京，游说加贷续保和借钱还贷都是第一议题。虽然眼下不太平，海运是不可能了，但河运是完全做得到的。他比谁都明白，船的宝贵并不在其本身，把它们开进横贯了几乎整个中国东西部的万里长江才是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只要能给“门字号”们一个只有风浪险滩而没有舰炮鱼雷的江面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不仅还息还本轻而易举，更会为新国家创造一个经济奇迹。1948年率先开进长江的“荆门”、“夔门”两艘新船上佳的运营状况，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对总理、长官、代表、委员们喋喋不休地讲着这个道理，“祥林嫂”似的弄得新贵们不胜其烦，终于从1950年8月的内部提醒——“与民生合营将成为政府的包袱”¹¹⁸⁶弄到1951年11月的公开斥责——“该公司卢作孚……企图把包袱加到政府身上来”¹²²⁴。4个月前还“原则同意借款1000亿给民生公司用以偿还加贷”¹²²²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

历经几十年世态炎凉的卢作孚怎么会看不懂这般脸色？怪只怪天地翻覆之际他还是执着于不变的价值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把约定、合同这些东西看得比命重，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总会计师王庭枢拿出一部明细的“债务说明书”去执行并完成它们。这可不是简单的“还本付息时间表”，而是能够依此向各方——借贷方、制造方、中介方、担保方谈判、协商、折冲的数据依据。这也是每笔大额借贷中难免发生并可以协调的，例如利率汇率的变化、交货延误的赔偿、拖运和修理成本、折旧成本、保险等等。可是这本账目的具体经手人，他的财务处经理室主任王庭枢此刻已经再也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和体面去厘清它，去辅佐他的总经理了。被打得七晕八素的祖父此刻终于明白过来，没有人真的想要这笔账目清楚，除了他的总经理卢作孚。

王庭枢和一大批民生高管是“三反五反”第一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到1951年底他被遣返老家汉口，“卢作孚”对于他就永远只是一种痛苦、一个符号和一段传奇了。

到了1951年10月，卢作孚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国民政府正式撤保，新政权的政务院、中财委、交通部和西南财委的承诺全部落空，加方终于下狠心根据抵押合同依法解决问题——在香港法院起诉民生公司，扣押7艘加贷轮。

此时的民生公司早已不是卢总经理所能掌控，加之7艘加贷轮上的船员都是大陆籍且大部分是四川籍，在前景不明，人人归心似箭之际，稍有鼓动，7艘加贷轮即悉数开往广州并佯称海员罢工，不再开回香港。据说事后革命海员们还给加拿大政府发去了抗议信，由王世均译成英文面交加财政部。这就是“七大艨艟，完璧归赵”始末。

这让卢作孚情何以堪！须知19个月前正是同一位王先生在他的授权下补签了抵押合同，白纸黑字墨迹未干，这是多么严重的违约！悬挂了人家一年多的国旗，又是多么恶意的欺诈！

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底气。游说已毫无意义，可怜他却还在絮叨，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船都回来了，是不是应该履约……”。看他最后的两次、遍查史料无以得知其目的的进京记录，谁又敢说他死了心、闭了嘴？

以死谢天下

多年后，当卢作孚又重新成为一位“伟人”甚至“完人”后，许多口述史将“七大艨艟，完璧归赵”的“功劳”归在他的头上，说是他精心策划和安排了这一切。这个说法不管出于何等善意都不啻是对他的误解甚至侮辱。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从常识角度看，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他因加贷而生的所有焦虑和为偿还而做的所有努力，他1950年3月10日授权王世均补充签定的抵押合同，尤其是他的赴死，都没有了意义。

资深卢作孚研究学者赵晓玲出版于2010年的专著《卢作孚的选择》这样写到：

“……许多回忆里都说，这七只新船的驶回是卢作孚一大功绩……总说七只门字轮是‘巧渡’，但卢作孚内心深处应该明白，从商业道德上讲，这不是一个好的结果。虽说民生公司开走了做抵押的轮船，但不能偿还欠债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他不是“应该明白”而是“非常明白”这个结果有多坏，坏到他从未承认过自己立下了这份“奇功”，坏到从事发到赴死前的这100多天中，他一字不提此事，黄任老哀辞所言“不居功”和“不求名”更是无从谈起！抵押合同已经生效，从法理上讲“七大艨艟”已经归属三家银行，与中国民生、与卢作孚已经毫无关系。他但凡有“邀功”的企图，那就可真是太容易了——令加方钱、物两空的“巧渡”反正是哗变或者起义、革命或者造反的既成事实，是连解释都不用解释的“人力不可抗拒”。就连那最后的问题——“责任该由谁来负”也不是他必须回答的。此时此刻的卢作孚不但可以借机从加贷泥淖中彻底脱身，更可一身轻松地踏上进北京——住大宅——做大官——阖家荣华的坦途。

可大不幸他是个绅士，是个弱冠之年就将名字改做“孚”（古语“信”也）、把荣誉和信誉看得重于性命、终生的座右铭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名字曾被印在货币上作为银行信誉保证的绅士。唯其是她，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中那致命的音符“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成了逃无可逃的宿命。

出版于2014年、大量采用了档案和文献的《卢作孚年谱长编》，是目前权威的卢作孚研究专著，可在1951年编中竟然没有一份档案，一份文献，一份卢作孚的谈话记录涉及这一事件。如此一件“丰功伟绩”，《长编》的记录仅一个句子——“到本月（10月）底……民生公司滞港的……等17只轮船全部安全驶回大陆境内”，且注明是口述¹²²³。编中的时间节点也相当诡异：整个1951年的9—12月卢作孚至少去了北京3次，且恰巧10月底“巧渡”事件发生时他人在北京而不是香港。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在北京遥控策划和安排了“巧渡”，要么他事先就策划好了，船员们只是待机执行。那可就真算得上是“运奇谋”了。

可到底是卢作孚“运”了奇谋还是“奇谋”运了卢作孚？

先来看“巧渡”前因：这就必须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民生公司驻加拿大代表王世均先生。是他从渥太华获悉“加拿大政府将依法起诉民生并扣押船只”的情报，紧急通报了香港公司，这是10月的事。在王先生事后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33

辑上《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经过》一文（也是被引用最多的“巧渡”回忆文字）里，这份重要情报的接报人竟然一次都未出现过“卢作孚”三字，而是代之以“香港公司”、“重庆公司”、“我们”、“上千海员”“他们”等语焉不详的宾语。这是疑点之一。王先生的文章从1944年卢作孚规划贷款造船写起，到1951年加拿大银行财、物两空止，事无巨细，连他将“上千海员的抗议信译成英文面呈加拿大财政部”的细节都写到了，偏偏一字不提1950年3月10日在卢作孚授权下他和三家银行签下的、其抵押物就是“七大艨艟”的抵押合同。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就这样被“故略”了。这是疑点之二。

再来看“巧渡”的后果：

“巧渡”的后果相当成功，可怪就怪在七十年间就楞是没个人出来领这份“头功”。前二十多年无人提起（黄炎培除外）倒也罢了，可在能说些实话的年头里大家又一哄而起把“头功”记在了卢作孚的头上，却明显缺乏细节，尤其缺乏“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这种传统细节；也缺乏激情，你转述我，我转述你，好像谁也不愿承担原创责任似的。有一篇1996年的出版，署名李天元的文章——《卢作孚率民生船队归来纪实》，是唯一两次被《卢作孚年谱长编》引用相关“巧渡”内容的文章，全文近7千字，提到“七艘门字轮号回广州”不足300字，其中提到卢作孚的2处，其牵强、八股和无出处好生轻率。

拿卢作孚1951年的所谓“运奇谋”与1938年同一个人亲自策划、组织和实施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那些充满细节、激情澎湃的记载（包括文献、档案和口述）相比，前者简直上不了台盘。反倒是黄炎培先生的哀辞“……还运最后的奇谋，七大艨艟，完璧归赵，而不居功，而不求名”充满了感情色彩，却不料又急转直下以“几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间诸水滨”之句结尾，引人满腹懊恼，无尽狐疑。

“巧渡”成功后不到一个月，1951年11月24日，中财委（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即向民生公司发出《关于民生公司问题的通知》，指称“由于该公司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加以公股代表人数太少，以至形成该公司每月仍入不敷出，而目前负债已达七百五十亿元，到年底将达一千亿元，而该公司卢作孚经理等则根据其1.政府需要此企业，2.政府反正不

能使工人工资不开销，以及 3. 借款始能纳税等的分析，企图把包袱加到政府身上来……为了掌握这一企业，必须帮助其改善企业管理，彻底进行民主改革……”¹²²⁴。9 天后，《新华日报》以《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为题，对民生公司做了严厉的批判。这哪里像是对待“功臣”的样子？就连“胜利之后杀功臣”都不像！

卢作孚一步步被逼上了绝路。

从“巧渡”到自戕，他又苟活了受尽屈辱的 100 天——乞援、被拒、呵斥、训诫、蔑视、疏远、诽谤、恐吓……被“公家”，也被自己人。黄任老哀辞中一句“奇难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写尽了卢作孚死前的悲苦。100 天中他最后又去了北京两次：1951 年 12 月下旬一次，就是“周恩来提议他担任交通部要职并为他的家庭安排了在京住宅”¹²²⁷那次，可惜找不到任何文献或档案支持这一口述；最后一次是 1952 年 1 月，自戕前一周，大年初二到京，年初四回渝，就是“飞北京商量要事”¹²²⁹那次，和谁？何事？也找不到任何文献或档案记录。

这 100 天中的卢作孚是踌躇满志还是去意彷徨，恐怕谁都看得出来。

1952 年 2 月 7 日，中共西南军政最高长官接见了卢作孚并单独留下他午餐。翌日晚，卢自戕，时间不足 48 小时。

那瓶美国安眠药他早已带在身边，也许直至 2 月 7 日上午，他还没有彻底绝望：毕竟你们亲口承诺过担保和借款，毕竟民生已经公私合营，毕竟全部船只包括“七大艨艟”已在你们手中，眼下别说增加公股代表了，就是让我告老还乡，全部股权你们都拿走，只要能保住民生公司，能过加贷这一关，都在所不惜。2 月 7 日，这是卢作孚幻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日子。相比传说中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黄口小儿关怀的背叛，两根稻草，孰重孰轻，冰雪聪明如卢君，焉能掂量不清？不是稻草而是巨石——西南最高长官对新政权为加贷续保、还贷一事的最后拒绝，压垮了这匹曾经那样高大英武的骆驼。

1952 年 2 月 8 日那个悲惨的傍晚，竭尽全力，受尽屈辱却仍做不到守约的债务人卢作孚走到了人生尽头——多少人的信任、支持和帮助，我却因时代所困，不但完成不了你们

寄望于我的“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和使命，甚至连欠债还钱都做不到。那就让我以死谢友，以死谢股东，以死谢天下吧。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卢作孚确为一大事而死，那大事，正是“契约+信用”的工商文明铁则。他用生命作祭品，殉了它，也殉了他的中国梦。

7艘加贷轮的下场同样悲惨。它们并未“北归”，一艘也没有开进本应该是它们大显身手的万里长江，而是舳舻交错屈居番禺，不驶不航，不护不修，任期锈烂，最后连拆掉卖废铁的价值都没有，谈何“完璧归赵”，分明“南橘北枳”。

胡不归兮，胡不归？除了台湾海峡无法逾越，更难排除忌惮于法律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否则如何解释同样状况下的其他船只统统开回了上海，却只有7艘加贷船落得这般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反倒最早开进长江的“荆门”和“夔门”，在汉-渝航道上一直运营到1980年代，并在最革命的1966年被命名为“东方红62、63号”，由于伟人临幸的“东方红号（江峡轮）”护航而备极殊荣。

有关民生公司加拿大贷款最后到底清不清，还没还，我持高度怀疑态度。这三家银行在加拿大都是“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加拿大政府是怎样过的这一关，很难揣测。1970年中加建交前后，中国交通部曾多次找到祖父王庭枢，向他询问民生公司加贷债务问题，他老人家均以年岁已高，时代久远，记忆消失为由坚不开口。1980年代初，卢作孚之子卢国维先生两次到我家拜访，希望祖父写下回忆文字，亦被婉拒。他已被1951年的“打排球”吓破了胆，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彻底噤声。可怜的老祖父确实被封了口，却不是被卢作孚用钱而是被人用恐惧。这一封，就是整整一生。

眼下这笔70多年前的账我已申请交通部、外交部和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可惜分别被告知“凡涉及旧民生轮船实业有限公司的档案均盖有‘国家机密’印章”、“有关信息涉

及国家机密，属于不予公开范围”和“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条例》调整范围”。无奈之下只好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查询。以“Ming Sung, China”为关键字搜索，得到的是如下结果：

(该笔债务)1953年处于“债务纠纷(Disputes)”，1968年处于“无法偿还(Default on)”，1973年处于“索偿、谈判和处理(Claims,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此后，Ming Sung Industrial Co. of China(中国民生实业公司)的字样就再未出现过。最大的可能，就是1973年的这个“Settlement(庭外和解)”，一切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不了了之了，包括使一切发生、在档案中被记载为Dignitaries - Tso-Fu Lu——“尊贵的卢作孚”的这个人。

此时距中加建交已经3年。

卢作孚之死的逻辑链

卢作孚死后4个月，1952年6月10日，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向民生公司投资1000亿的建议：“估计到民生公司是中国有名的民族企业，船只甚好，在长江航务上又属必需的企业，此刻我们投资一千亿元（其中大部是将贷款转为公股），于名于利对我都是好的”¹²³⁷。但是请注意，这1000亿不是借贷而是债转股，且其中仅有不到100亿（151.6万港币+20亿旧币）用于还清北京中行加贷利息借款^{1166、1179、1196}，其余900亿全部用于“偿还以前的各种借款”¹²⁴⁰，而这些满打满算800亿的欠款¹²⁴⁰原是卢作孚自信满满能在2-4年内还清的¹¹⁹³。卢某人既然宁死都不肯欠加拿大人的钱，又如何会欠新政权的钱？他口中的“2-4年”一定不是诳语而是约定。更何况他生前未见一分，死后又全部被用来“提前”还清了尚未到期银贷的那1000亿，时价不过区区325万美元，而民生公司当时市值即被评估为8400亿人民币^{凌耀伦《民生公司史》}（约合美元2.8千万），还不包括香港公司超过2千万美元（包括7艘加贷轮）的资产。再退一万步，民生公司投资50%、卢作孚为董事长、卢绪章为协

理，被称为“共产党钱袋子”的民安保险公司^{王应麟《解放前的民安保险公司》、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也市值不菲，可不幸这些资产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全部是不许抵押、不许出售、无法变现的固定资产。卢作孚面对的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最恐惧的绝境——资金链的断裂，却没有哪怕一丝悲悯、一只援手。

不仅如此，随着卢作孚的死，连 1160 万美元（加贷总额）的“包袱”都卸下了、没有了！一条看上去多么美满、“于名于利对我都是好的”经济逻辑链。在这个逻辑链中，王庭枢断无清账之理，卢作孚断无不死之理，民生断无不“合营”之理。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的样板，第一例“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此概念由列宁首创）的典范，就这样诞生了。这也是王世均代表对那么重要的“抵押合同”不著一字，童少生代总经理为被他“忘记”的 1000 亿“贷款”背黑锅、遭唾骂几十年不做解释，祖父王庭枢对加拿大债务至死坚不开口的逻辑。当什么副省长、作什么政协委员，和乞求不再被当“排球”打，无非都是在巨大恐怖下的生存术罢了。与其追究这些人“卖主求荣”、“贪生怕死”，还不如责怪 17 岁就读了卢梭《民约论》（现译《社会契约论》）的卢作孚。在近 30 年惨淡经营实业的苦旅中，他严重受缚于一条文明社会规则：“竞争中可以选择的手段范围要在可以保证竞争失败者最基本利益不被损害的范围内，首先就是要把暴力竞争手段排除出去”^{《社会契约论》}。卢梭认为人类联合起来，订立契约、成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天赋的自然权利。定约是为了确立指导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即公义原则——“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不是丛林法则——“Life or death（你死我活）”。这也是“工商文明”、“有限责任制”概念的起源，和“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这些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卢作孚，你甚至可以说他是被这位本家——卢梭的这本书给害死了。作为企业家，他视承诺为最大的价值，而承诺就是“契”和“约”。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却恰逢只有“契”没有“约”、甚至连“契”的概念也没有的年头，而他无法顺应新潮流。1950 年那份生生把“约”变成了“契”的抵押合同就是个例证，他的苦心、“迂腐”都在其中，并且已经注定了 1952 年 2 月 8 日的悲剧。

可是，“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卢作孚之死，反思人性和两种价值观的博弈，谁又敢斩钉截铁地判断孰对孰错？黄任老写下的“其问诸水之滨”，谁又敢代其而答？

后记：中国呼唤工商文明

卢作孚死了，我那正值壮年，英俊潇洒的祖父剔光一头乌丝，几十年都不再蓄发，为的是不再被人揪着头发痛殴。他在汉口民生公司转世的长航局做会计小职员，战战兢兢活到将近八十岁，确认他的国家至少最近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了才不再剃光头，长出的却已是没有一丝黑意的如雪白发。

从公车上书、张謇创业、卢作孚出生的那个年代起算，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走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已经发生的一百年之路”的希望——以工商文明取代动乱、暴力、战争、专政、阶级斗争……并同样达到小康的道路。而且，不仅仅只是一个“希望”，它其实已经萌芽、吐蕊并且在差不多 15 年以后进入过一段被西方人称作“黄金时代”的好时光（见《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法）白吉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这也正是卢作孚们的中国梦酣之时。只是这段好时光实在是太短了，短到完全来不及孳生强大到足以阻止一场异族的入侵。但是异族的入侵并没有使它夭折，无论是南通的“村落自治区”，无锡的“劳工自治区”还是重庆的“北碚实验区”以及沪、宁、穗、汉、京、津等大城市的各种“自治区”，并没有如一些研究近代工业史学者所归结的一天折于日本侵华战争，实际上它们都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无声地承袭了张謇、荣德生、卢作孚们殚精竭虑打造的自治理念，拥有几乎全部他们所规划、所创建的设施，从完全小学到养成所，从俱乐部到医院，从花圃动物场到浴室理发所，从膳食部到公共食堂……它，就是百姓叫做“二政府”的企业社会化，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国家模式。它为一个不强势的官僚系统弥补了最为重要、最为薄弱也最为致命的缺陷——国家的基层建设，使这个刚刚由皇权转入民国的国家尤其是它的城市不致崩溃和倒退，并在一个

不长的时期内主导了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而这“两化”恰恰是构成现代文明——工商文明的重要标志。

然而可悲的是，这一次历史给它的时间机会就更短了。在国共血腥内战的枪炮声中，在苏联红军枪杀张莘夫的子弹声中，在“三反五反”的呼啸声中，在庆祝“公私合营”的秧歌声中，它迅速地枯萎、凋零，终于彻底灰飞烟灭了。

卢作孚之死当是它生命挽歌的最后一个音符。■

(页码标注凡无说明，均为张守广2014版《卢作孚年表长编》)

附录1：卢作孚死后36天黄炎培先生写下的哀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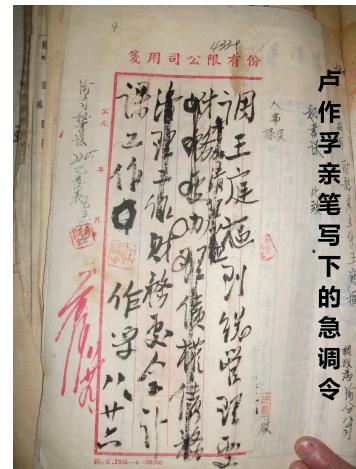
“呜呼作孚！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乃大集有钱者之钱，以创“民生”。辛辛苦苦了卅年，长江几千里，内河几十道，平时载客载货，战时运械运兵。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有罪归我，有利归人。奇难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君为何来？

为的是人民。终得从黑暗中眼见光明，眼见全大陆的解放，眼见大中华的复兴，还运最后的奇谋。七大艨艟，完璧归赵，而不居功，而不求名。呜呼作孚！君其安眠吧，君实为此大事而生。作孚！作孚！我是君卅年之老友，我以爱君敬君之故，曾历访君早年事迹于北碚，于泸州，于少城。又曾多次为民生乘客，实地察君所经营之事物，所识拔所训练之人。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呜呼作孚！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君其安眠吧！几十年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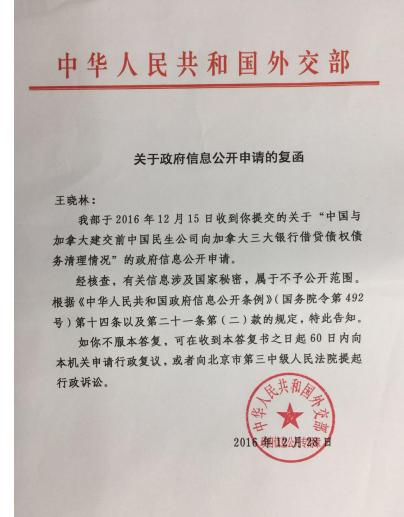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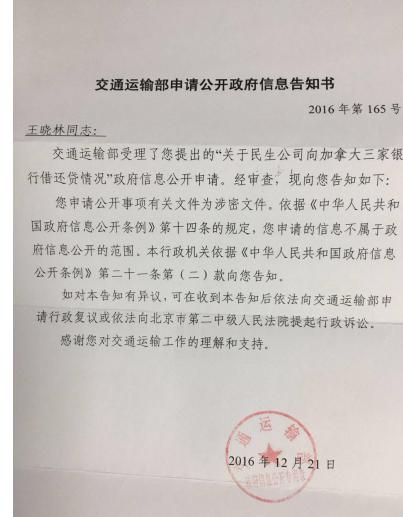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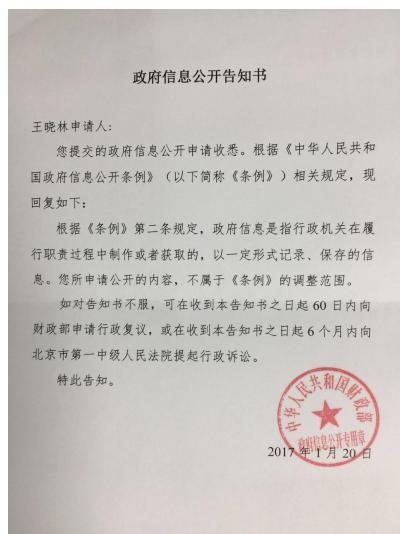
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年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 君既歿三十六日”

附录2：



附录3：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附录3：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查询结果部分页面写于2017年1月

Searched for: Ming sung china
Found: 1 - 24 of 24 (0.1 sec)

Didn't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earch all Government of Canada websites and ancestors search

-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 POST-WAR LOANS AND GUARANTEES - PART II OF THE EXPORT CREDITS INSURANCE ACT TO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 PAYMENTS -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LTD, 1958-1960. File. RG19-F-2. Volume/box number: 5165. File number: 8412-02-2. Textual material. [Access: Restricted by law]. Government. Finding aid number: 19-29
- PRIVATE LOAN TO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OF CHINA FOR CONSTRUCTION OF SHIPS IN CANADA, 1949-1957. File. RG20-A-3. Volume/box number: 1950. File number: 20-12-2. Textual material. [Access: Restricted by law]. Government. Finding aid number: 20-5
- GUARANTEE LOANS BY CANADIAN BANK TO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LTD RE CONSTRUCTION OF SHIPS FOR GOVT OF CHINA VOLS 1-3, 1946-1961. File. RG20-A-3. Volume/box number: 946. File number: 7-

648. Textual material. [Access: Open]. Government. Finding aid number: 20-5

4.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 EXPOR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POST-WAR LOANS AND GUARANTEES - CHINA -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1972-1973. File. RG19-F-2. Volume/box number: 5293. File number: 8020-03-3. Textual material. [Access: Restricted by law]. Government. Finding aid number: 19-29

5.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 EXPOR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POST-WAR LOANS AND GUARANTEES - CHINA -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 CLAIMS,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S, 1973. File. RG19-F-2. Volume/box number: 5293. File number: 8020-03-3. Textual material. [Access: Restricted by law]. Government. Finding aid number: 19-29

6.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 EXPOR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POST-WAR LOANS AND GUARANTEES - CHINA - MING SUNG INDUSTRIAL COMPANY - CLAIMS,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S, 1949-1971. File. RG19-F-2. Volume/box number: 5292. File number: 8020-03-3. Textual material. [Access: Restricted by law]. Government. Finding aid number: 19-29

7. MING SUNG INDUSTRIAL CO LTD. DEFAULT ON LOAN - GUARANTEED BY THE GOVTS. OF CANADA & CHINA. LOAN ACQUIRED TO FINANCE CONSTRUCTION OF NINE VESSELS, 1949/12/19-1968/06/14. File (Accession level). RG13. File number: HQDOJ-9-157527. BAN: 2000-01084-9.

【述往】

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彭先度

北大

我在北大只呆了四年，没有多少骄傲和乐趣可言。但我忘不了北大，甚至还有魂牵梦萦牵肠挂肚的时候。

第一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校长是马寅初校长。

我第一次见到马校长是到小卖部买饭盆。那天午后不久，外面有人欢呼“有饭盆买了！”

28斋出门就是小卖部，营业员正从黑色的乌龟壳轿车里往小卖部搬饭盆，小卖部年岁较长的营业员哈着腰在和一位矮胖的老人说话。轮到我买饭盆的时候，那位营业员进来问我们：

“你们认得刚才那位（和我说话的）老大爷是谁吗？”没有人回答，但都表示了不认识。他告诉我们，那就是马校长，并且说要不是马校长，你们怎么买得到这样又好又便宜的大饭盆！当时我不以为然，但饭盆确实是好，厚厚的，很沉（重）。后来才知道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物资极度匮乏之中。这个饭盆我用了三十年。北大四年，每天带着它穿梭于寝室一大膳厅一教室一图书馆一运动场之间。在劳改队磕磕碰碰一年，回长沙后用到1989年时，底部边沿有个锈点透了孔，我才小心包好收了起来。1994年第二次搬家后清点东西时，那只饭盆不见了，听到15岁的大儿子说把他那个“破盆”扔了，我顺手一记耳光把他打得翻过我的卧床摔到对面墙脚，两天后到医院才退下烧来。又是十年以后，他妈妈告诉我，从医院出来后，他们母子在废品店寻找了一星期，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饭盆。

第二次见到马校长是在1959年除夕和1960年元旦交接时，马校长带着校领导和学生团拜。马校长不停地拱着手，不停地喊着“恭喜发财！”从主席台南边走到北边，又从北边走到南边。学生们愕然后鼓掌欢呼。

再见到马校长那是在批判和斗争他的大会上，大膳厅一次，办公楼小礼堂一次。舞台上的情形和我在中学时看到的斗右派的情形差不多，许多人围着他指手画脚甚至拉拉扯扯，同时大声吼叫。不同的是马校长不像大多数右派一样俯首帖耳一言不发，他挺着身昂着头挥动手臂予以辩驳。台下的情形和斗右派则大不相同，没有激愤热烈的情绪，只有无声的沉默。即使台上领着喊口号，应声者也是七零八落寥寥无几。台上斗他，人多势众，然而奈何不了他，有人示意把他拉下台了事，不料马校长神威大发，摔开拉架的人群走到台前郑重宣布：“我的理论，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有理有据，你们批判我要拿出理论来，要拿出证据来！我虽年近八旬，仍要单枪匹马和你们战到老死！”

老人从容走下北大舞台，稳步在历史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这不是杖朝之驱，是战神！是智慧之神！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马校长，他的话却深深地烙进我的心灵。

对于老人家的“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当时我就理解了，接受了，因为

他已经战胜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谬论。

我在纪念马校长的文字中写过：马先生是同辈和几辈学者的万幸者，他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第二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韩其昌先生。

进北大我就参加了武术队，武术队的指导老师韩其昌使我惊异不已：最高学府的讲坛上居然有个一字不识的文盲！

当时国家体委取消了拳击，提出武术向表演发展，北京体育学院武术系指导和训练我们正是这样做的。韩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他说武术运动的精髓就是击技，没有精髓还有什么项目？看武术表演不如看京剧武打，看动作形体优美不如看舞蹈，武术能够存在就在于他的击技艺术，取消了击技就取消了武术，像拳击一样。我们当时热衷于学国家套路，尤其是健将级套路。韩先生给了我们致命一击：健将级刀枪剑棍拳五组套路，没有一个小节是他不能击破的。为了回击这个风气（路线和方向），他经常带我们到天安门、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去表演，真拳真脚地实干，那时是没有皮手套的哦！我师从韩先生练了三年梅花拳，算是小成（大成十年），曾和七位师兄联手与韩先生进行过一次较量：八个人围攻韩先生，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八人全都趴下，两人贴了两个月的膏药，我的膝盖留下个分币大小的永久疤痕。当时韩先生六十八岁，我最小，二十二岁，燕师兄最大，二十四岁。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来抓我的时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的前辈师兄，他是韩先生在志诚中学时的弟子。武术有了散打比赛和擂台以后，前几名通常是韩先生的晚辈传人。武警部队成立，我的师弟、韩先生的儿子健中出任全国武警部队总教练。

韩其昌先生是梅花拳泰斗，武术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他这个泰斗毫不逊色！我在北大的终生憾事之一，就是没有帮韩先生把他的学说整理成文字。

第三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程庆民老师。

程庆民老师教我的解析几何时间不长，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他之所以打成右派，是他不肯把自己的学生打成右派。

第四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闵嗣鹤先生。

闵嗣鹤先生教我的时间最长，他在课堂上的声影至今历历在目，他推着前筐里装着蔬菜的破自行车的形象仍时常在我脑海浮现。

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的还有我的许多同学。

徐明曜和我讨论过音乐，说我们湖南民歌喜欢用 6（低音），3（高音）和 4（中音）。我借过一套当时很时髦的毛选，上面的藏书人是徐明川，同学们说毛选是徐明曜的。徐明曜的自行车经常是我进城的脚力。

祝长忠、袁国兴和我排练过民乐合奏《春江花月夜》。

李福星看过我写的东西后笑着用他的客家音骂我：“KI KI GUI GUI GUO GA HUO”（奇奇怪怪的家伙）。

麦结华在双杠上练臂力。

陈华贤在寝室里背外语。

田自贤有机会就哼着他那独特的京剧。

小丁子指挥着唱歌。

腼腆的王理。

张扬的张克仁（大家叫她张克侠）……

1963年暑假我去福建长乐慰藉没有兄弟姐妹的林世中的寡母，与陈秋农结伴南下，在他家里逗留两天。他领我游太湖，走到一尖角处，看着水天一色的茫茫湖面，我禁不住吟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没想到拐过尖角，一块硕大的湖边石上赫然刻着这一名句，我两大笑，前俯后仰。后来上面审我此行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我没有说这个故事，但愿秋农没有受到牵连。

学生时代还有件事不能不讲，尽管它悲哀凄凉。

1960年10月，全年级到十三陵理科新校址参加修筑铁路路基的大会战。我把《云雀之歌》的歌词改写成：“蓝天白云风和日暖，矫健（的）云雀高高飞翔，数一（的）同

学个个干劲大，（嘿）愉快地劳动纵情歌唱。”这几乎成了我们的班歌，清晨唱着她整队出发，摸黑唱着她收工回家。可谁也想不到祸从天降，胆小怕事身体虚弱的方肇满突然得了急病，校医草率地诊断为感冒，第二天晚上情况大变，好不容易才找到电话报告校医院，几个小时后校医赶到时，肇满已经死在我的怀里，整个胸腹成了硬邦邦的铁壳，他得的是急性肠梗阻。

1979年秋北大给我平反，在学校见到徐明曜和田自贤，明曜留北大（当时不知他回北大的辛酸事）和自贤进部队我很高兴，尤其听说在广西的麦结华锋芒初露就锐气凌人，心里得到很大慰藉：总算还是有些结果。前不久通过明曜知道了还有百多位同系同年级的同学保持着联系，高兴的情态是几十年中不常有的，我祝贺同学们的成就，更敬佩同学们的坚韧。功炎同学的离去震动了我，遂决定参加大家的纪念活动。排除自卑自弃，大家搀扶着多活几年，借此机会祝福大家健康长寿，争取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进步。

1983年10月，妻子带着10岁的小儿子到北师大探亲，我兴冲冲地领他们到北大，告诉他们当年住在哪里，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看书，在哪里上课，在哪里锻炼身体。一到未名湖，儿子就兴奋地说：“我见过这里，在爸爸的照片里！”妻子说：“不要说是学校，就是公园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他们还没有去别的地方）我们决定绕未名湖一周。走着走着，一个溜须拍马的外国人的墓碑挡在眼前，我大声问天：“这还是圣洁的未名湖吗？”妻子和儿子惊奇地望着我不明所以。其时，我对司徒雷登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我不得不坐下来平静一下自己的思绪：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大管北大事的时代中断三十年了，他还会回来吗？……很久以后我扫兴地说：“我们回去！”患难与共的妻子知道我生了极大的气，拉着儿子默默地跟着，不管儿子怎样地争辩，怎样地不愿。

反革命

1963年5月某晚，林世中和生物系的王萃文不知什么原因与我讨论起了“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他们告诉我想去外面世界去考察一番，看看人家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没有邀我，我有父母等着我抚养，有妹妹们等着我照顾，也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想法。期末考试结束后他们走了，没有和我道别。我决定南下林家抚慰一下林世中的母亲，我知道林世中从小死了父亲，是母亲守寡把他养大的。

8月底我回到北大，同学们的冷淡和回避使我知道他两出事了，很快又发现从早到晚都有人盯着我。我照样生活、学习、锻炼。国庆前夕，我从外语课堂上被带走投入不到两米宽的牢房，两隔壁从早到晚不断地响着铁链声。半年后让我写信回家我才知道那里叫北京市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旁门。

我被审讯了两年，第一年是完全的单独隔离，从进去直到半年以后我才抛弃了重回北大的幻想。第二年进入大号，最多时到过八人，一般是四人上下，除偶尔有一两个“闲杂人等”，全部是知识分子政治犯。第一个能接触到的难友是北大地理系的常安之老师，坐牢八年他还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看到王富洲等从北坡登上珠峰的消息时，他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我不在，不然可以搞清楚好多课题。

两年的时间要读好多书，要做好多事？而我只是等着提审，等着结果。以前没有时间想的问题在这里想了两年，两年真的把我这个学生审成了“反革命”。给我的定性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我承认反党，确切地说是反对当时的党中央，更具体地说是反对几个决定错误政策的人。我不承认反人民，坚称自己爱国爱人民。给我的定罪是反革命集团和造谣。我否认造谣，我讲的都是在1962年整社运动中看到和听农民说的，坚信农民说的是真的。他们有一个万能的致胜法宝：“你立场反动，所以一切都是错的。”

至此，我明白了“章罗联盟”、“彭黄张周”以至于“高饶”“胡风”是怎么回事。

文化革命

我这一生没有几件值得庆幸的事，文化革命遇到的第一件事却确实值得庆幸：1966年

10月我被从黑龙江音河农场遣送回老家长沙，那是从劳改农场遣送回家的最后一批。

一下长沙车站我就被几个红领巾围住了，一位小同学向我敬了个队礼问道：“大哥哥你怎么不带毛主席像？”我愣了一下很快用东北话答道：“我们那疙瘩还没有。”“那我送个给你，你可要天天戴好。”小同学边说边掏出一枚精致的毛泽东像章端端正正地别在我胸前。我一看旁边遣送我的詹队长尴尬欲言又不能言的样子，连忙介绍说：“这位是我们领导，他也没有。”小同学迟疑了一下，还是送了一枚给他，也给他端端正正地别胸前。小同学们一走，詹队长高兴得跳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真是谢谢你了，彭先度同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长沙饭店煮饭。煮饭是两个编制，两班倒，有一个病倒了就不能工作了。吃饭的人天天增加，找了几个人都不能胜任，我妹妹的干爹叫我去帮忙。我跟了曹师傅一个上午班，他把煮饭的技术和绝活在煮饭的过程中详详细细教给我，说到绝活处他还特别强调，不是事急决不会才见面就教我的。我机灵地说就做他的徒弟，他说就是徒弟也要三年慢慢教。他下班后看我单独操作了一个多钟头后，惊讶不已但是放心地走了。

我接手后，红卫兵串连已达到高潮，长沙饭店是当时长沙最大的饭店，离火车站只有50米，到这里吃饭的红卫兵每天排着长队。当时大饭店都是煤火大甑饭，每锅七八十斤米。煮饭的关键，一是做火，要确保那一甑饭一气呵成；二是撩米沥汤，早了蒸不熟，晚了一团糟，师傅的诀窍和后手都在这里，而且各有一套。红卫兵最高潮时我建议添一台灶，领导说编制没人批，我说一人管两灶，领导说曹师傅年岁比你大，又没有你舍得死，肯定不行，我说可以统筹优化一下，领导听不懂，我解释说，把煮饭要做的事都列出来，排个最好的顺序。领导默想半天后大声说，你这小师傅真行，帮我过了个大难关，下次评劳模我提你的名。

红卫兵潮水来得快退得也快，不到一个月就冷了下来，饭店也停止了免费供应，所有职工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领导叫我到办公室说：小伙子干得不错，为文化大革命立了一功，临时工好办一点，我们算你做了三十天，发给你四十四块四毛钱。你填个表我们报上去给你转正，工钱不会有这么多，你放心，也不会让你从学徒干起。哪知我填的表把整个办公

室人的脸都吓白了，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满心高兴的我一下就冷了半截。

我比同学们幸运，文革中没挨过打。前期他们互相争斗顾不上我，各派拥护的人我都不拥护、不参加。后期我也挨过批判，但批判我的主力都不同程度地靠我吃饭，事后有些人还要跟我说是被布置的。谁都知道我的脾气，主事的人也不敢轻易给我坐飞机挂牌子。

文革中我打过一架，那时正是立（抢）单车成风，几个人在水风井立我的车，他们当然不是我的对手。

林彪事件发生后，派出所给我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我知道我的事，要他们拿依据拿文件出来，刚从47军转业的杨户籍说：你这样的人还要什么依据！要什么文件！莫须有的事情我已经历多次，像这样直截了当却是头回。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曾令我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先富起来”，“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不但认同，简直就是我所想。我丝毫不在意永远“没有正职的第一副”，放手实践着“伴随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的政治改革”。妻子从没有要我做过家务，正要辅导的儿子很少见到我的身影，连北大补发的毕业证和北师大颁发的硕士文凭都没有去领取。

但是，透明的注重实效的作风和曾经推广宣传的工作方式仅仅是昙花一现，碰不尽的钉子和穿不完的小鞋搞得我焦头烂额鼻青脸肿。曾经承诺过的越离越远，一再严禁过的愈演愈烈。我终于明白，我不属于官群，也不属于利类，更不属于集团。1987年下半年我选择了自由职业，1989年下半年我去了泰国，1994年母亲去世回到长沙。

1996年9月，高中同学40年聚会，有张姓同学告诉我：1984年我在长沙市环保所所长任上得罪了刘副市长，当时有个人到环保所报到，听说我要口试后不敢来了，这个人是刘副市长安排来的。我听后一拍大腿说：他怎么连话也不捎一句，我再清高也不会不食人

间烟火！张姓同学淡淡地说：你应该知道的。刘副市长是我初中时很敬仰的教导主任。

母亲 妻子

我出事的时候，母亲是居委会主任。1963年底，长沙市东区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即将开始，给母亲准备的大红花、奖状和奖品放在主席台第一位。区长已经宣布大会开始，区委书记匆匆跑过来叫他暂停。区委书记把坐在前排的我的母亲叫了出来带到会场外面，向她传达了我的事情，宣布了他的决定。母亲没有倒下，忍住了眼泪，默默地离开。

无论是亲戚六眷还是左右邻居，没有一个说我母亲不好的人，在我的视野里，文化革命以前的街道主任，在文革中没有挨打，没有人上门找麻烦，母亲是仅有的。

我和妻子是个缘份。

妻子小我十岁，我们1968年结婚，已经四十二年了，期间我的身份不断变化：劳改释放犯—四类份子—国家干部—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她随我受过白眼，打过地铺，流过浪，游过山水，出过国，始终是低不卑，高不傲，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结婚前她们家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居委会干部，她所在街道工厂厂长、副厂长，父母亲，姐姐和还不懂事的弟弟。她母亲是治安委员，姐姐是入党积极分子，她自己是厂政治宣传员。开会的人摆出许多男青年与我相比，说我不但一无是处，而且靠不住，很危险。这些人说了两三个钟头，她就是撬口不开。大家逼着她表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只好站起来说：“请你们说句公道话，你们说的这些人哪个受过正规训练？哪个走路的姿势有他好看？”众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不欢而散。

我戴上帽子以后她们家又开了个会，主题是坚决离婚。这次只有家里人，但有了充分的理由：母亲治安主任当不成了；姐姐的入党积极分子泡汤了。妻子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往中间一站，指着自己的大起来肚子说：“谁有这样聪明漂亮的儿子？我再生个这样聪明漂亮的女儿，谁比得上我？”（第二个还是个儿子）

当四类分子的第一次劳役是到派出所洗东西。我们一行八分子到了派出所，小坪里堆着要洗的东西。我一看有些不对头，叫他们先把东西分开，一堆是棉被、棉褥、棉大衣，一堆是单制服、衬衣和便衣。我指着要洗的东西说：这堆是公用的，我们洗，那堆是私人的，我们不洗。洗完公共东西后我要大家回去，结果没人敢动，我走了。

四类分子最多的劳役是扫大街，差不多每次这样的劳役前，厂长（民众主任）先喊我去事或加班，母亲和妻子总是加入扫大街行列顶替我做这种劳役。

良母贤妻得一即福，而我两福全得，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

【述往】



作者简介：

梁沪生，笔名“独酌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历任峨眉电影制片厂《电影作品》期刊主编、文学部副主任、峨影创作策划部副主任等职。忝列一级编剧。编导的电影作品有《小巷名流》、《泪血罂粟花》、《来不及道歉》等20多部及电视连续剧《荣生茂风云》、《武陵山剿匪记》等。获四川省“双十佳”评选十佳编剧称号；获四川省文学艺术界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07年始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原川师大影视学院）导演系、戏文系任教。主讲《影视写作》、《影视导演基础》、《影视创作实践》等，多次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自忖舞文弄墨大半辈子，大多所作，或为稻粱而谋，或为遵命而作，未能篇篇直抒胸臆，不能说不是憾事一桩。老夫聊发少年狂，含贻弄孙之余，将数十年来所见闻所历之事，搜索记忆之碎片，加之所感所悟，从从容容、徐徐缓缓娓娓叙来。不求粉丝喝彩，但得自娱自乐，友人分享。

情爱篇（1）

梁沪生

凉某和小银是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即1968年相识的。

那正是两派还在武斗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那个时间段，工厂停产工人不用上班，在这座近万职工而青年男女就占了85%以上的国营企业里，所谓的群众运动已由一年前的轰轰烈烈而转为势微，当大多数二十郎当岁的少男少女已对当革命闯将不再感兴趣时，自然便把精力转移到男欢女爱上面来。

凉某和小银就是这样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相见、相识、相恋的。两人都是普通青工，不在同一车间。那时候不开工却每月工资照发（虽微薄却足以对付伙食费用），有充足的时间天天厮守，足以使这场恋爱平静和谐良好地发展了四年。一切似乎水到渠成就待谈婚论嫁。

一个事件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为了恢复平衡，故事里的人物便采取行动，最终导致一个结局……这是世界上所有戏剧性故事几可概括的模式。这是很多年以后直到今天，凉某在给学生上剧作课时的必讲观点。

凉某的爱情故事当年出现的第一个激励事件是小银父亲的出现以及他对这场恋爱的反对立场（之所以在这里不用粗暴干涉横加阻扰这样的词语，是因为现在已对老泰山当年的立场充分理解以及对逝者的尊重）。老泰山当时成都某个电力设计院的保卫科长，一听说女儿谈恋爱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调查男方的家庭背景。这工作对保卫科长来说轻车熟路完全属于他的专业范畴。于是展开外调行动。

凉某的父亲在一座当时使用代号和信箱号的军工企业当工程师（无党无派的纯技术人员），以任职部门和职业而言，基本上可以说门当户对。不幸的是外调的时候，

他正被以英国特务嫌疑的身份关在牛棚里（关于英国特嫌问题，拟另文专门交代）。为了让今天的小朋友们不致看得云里雾里，不得不赘言几句。凉父的历史背景乃两航起义人员（关于这场爱国主义的义举百度一下便知，再解释就更累赘了），而当时有大人物发话，这里面坏人很多，不乏美蒋特务。其时正是文革伟大战略部署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于是凉父便成清理对象被关进了牛棚（牛棚者，所谓群众专政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也）。

门当户对？瞎扯！明明就是对立的两个阶级嘛！女儿嫁给敌对阶级，这还了得！于是保卫科长便给身陷牛棚的英国特嫌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了断然绝然的回绝，信中有这样的辞句：“你是香港来的海外来客，我们是中国的穷工人，我们是铁路上的两股叉，走的不是一条道！”熟悉当年样板戏的看官一看便知，此言乃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对日本鬼子鸠山义正辞严驳斥转换而来。当凉某接过老爸递过的信看后，竟然笑了。

保卫科长采取的行动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拒敌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对内严加看管将女儿关在家中不许出门，连班也不让她去上。然而……

小银还是趁机从家里跑了出来，跑回了工厂。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工厂单身宿舍区的一个角落里，在昏黄的路灯的辉映下，两人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决定终生的会谈。

“分不分手？关键在你，你自己决定。”

“不分，要分我就不跑出来了。”

“那好，我们这就结婚。

“好，结婚。”

“我明天就去车间开证明办结婚证。”

“好，办结婚证！”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然而……问题往往就出在自以为问题解决了的时候。

第二天凉某拿着结婚申请到车间办公室盖章的时候，车间某领导立刻打电话到小银所在车间去落实。不想对方车间领导告之，女方家长不同意，此刻正在车间办公室反映情况（我仍然善意地不用‘闹’这个字眼）。于是开证明的事居然就这样荒谬地搁浅了。

然而，还是然而……别忘了那还在文革期间，脾气再温顺的人还是未免沾染了一点造/反精神的：不办结婚证又如何？不办结婚证老子照样结婚！

凉某这样想，凉某的朋友们也这样怂恿。

于是，在1972年的初春，在成都西马棚街37号的小院里（这是朋友的家，关于这里的故事以后还有的讲），一伙热心朋友张罗，每人凑了人民币2元钱的份子，居然就热热闹闹吃吃喝喝喜气洋洋地过了一天，然后高调宣示：凉某和银女士喜结良缘！

此事在厂里有点小轰动。有人说这两人真胆大，没有执照就敢开张营业。其实惭愧，没执照还真不敢开张营业，两人是和衣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各自归巢回自己的单身宿舍。此举的意义就是造就一个既定事实而已。这就是当年的年轻人，肯定让今天的少男少女们见笑。

没多久，承蒙双方车间领导开恩盖章，办妥结婚证。又承蒙一位朋友帮忙借到一间没有窗户的陋室，才算名正言顺正式安了一个家。

故事终于走向了结局。尾声是几年后退休的保卫科长终于也承认了这桩合法婚姻。

这个家延续至今，45年过去，屡屡迁徙多经乔迁。租住过工厂周边的农舍，搬进过改变用途的单身宿舍筒子楼……没有改变的是这个家的成员，而且添加了下一代，下下一代。

1972年那张文物般的结婚证依然有效。尽管盖章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已成历史。

至此，熟悉的朋友已经知道：凉某人便是在下——独酌翁本人。■

【读者来信】**1. 请客座主编是个好办法**

229期纪念顾准专辑，是顾准一书的作者王晓林做主编。这是一个好办法。一者可以减轻老方等人的负担；二者可以动员优秀人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三者有利于发掘更多的社会资源。■（深圳，刘国庆）

2. 应该加强工宣队研究

工军宣队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军宣队有专书谈到。但是工宣队没有。我最近与包头的朋友聊，他父亲是包头市委的，他提到，在打内人党的时候，工宣队起了很坏的作用，来自包钢的工人打人现象严重，而且是下手很重，把人往死了打。而这些人在运动后期没有得到处理。■（郑州，崔建功）

3. 学习女附中，唤起责任感

最近看到罗治写的《十年，我们这样走过》一文，想到两句话：学习女附中精神，唤起老三届的责任感。什么是女附中精神？我总结了三条：一是做实事，二是有韬性，三是敢承担。

女附中的老三届有那么一批人（鲍园园、陈琨、冯敬兰、高宁、高忆陵、郭莲莲、郝新平、黄光光、罗治、刘进、刘燕欣、李红云、牛立、叶维丽、于羚、许容、朱晓茵、王民培等）十年来，这些奶奶级的女生，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没日没夜，为回顾历史，反思文革，做了一件又一件实事。从2007年纪念卞校长开始，雕像、刻光盘、查档案，编资料，访老师，终于在2017年完成了48-68项目，出六本大书。

这过程的艰难曲折，内外交困，非亲历者不能想见。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6年3月14日，《远去的女附中》在与出版社签了合同，有版署下文批准，经中央党史研究室

审查通过，即将开印之际，版署电话紧急叫停，理由是“今年是重要节点，关于文革的书一律叫停下架。”

女附中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她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了心头的泪水，掩饰好对“肉食者”的鄙夷，又继续战斗了——“正式出版受阻，百年校庆快到了，我们不能干等着。2016年4月11日我们17位同学提出……用口述史、教育叙事、教育故事这三种更利于记录和流传的形式反映学校历史”，体现母校的教育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为母校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为百年校庆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为此组成了更多同学参加的丛书编写组。”

这就是我说的韧性，在中国要做点正经事，必须有韧性不可。这韧性来自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她们知道，用良知呼唤普世价值，正面的死顶硬抗不行，要学会打游击，钻地道，走民间。

经过一年多的苦干，这些女附中人拿出《岁月女附中》丛书，丛书由《口述春秋》《教育叙事》《史料文存》三个分册组成，《史料文存》又分为上中下三册，加上最初的《远去的女附中》，在短短的几年间，她们一共编印了六本书。六本书都是自印本，以成本价提供给同学。学校出钱部分是免费送给老师的。

“十年了，我们用这厚厚的六本书，尽了一点女附中学生的责任，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和怀念，也留下了我们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在这十年的过程中，我们有两个好姐妹刘蓓蓓，张育芷由于积劳成疾离世了；有四位姐妹因为用眼过度，做了眼睛手术；还有好几位同学由于匆忙赶路开会，摔断了胳膊，腿和肋骨。所有编写组的同学都以高度的认识和极端的负责精神对待为学校编写资料的工作。六本书，白纸黑字，记录了学校的历史，也镌刻着我们的成长。”

我要补上一句，这六本书，也彰显了女附中人的勇敢和承担——在妖雾再起，举世皆浊之际，她们用那老迈之肩，担起了历史的重担，这里有人生意义，有普世价值，有她们毕生的追求，有将逝的一代对未来的期许。■（北京 姜学斋）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